

東

方

雜

覽

第十四卷 第四號

國民紀元前八年創刊 \*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

第四十卷 第四號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發行

國際合作之前途.....陳世材(一)

當前世界政治的主流.....戴文葆(四)

蘇波疆界問題.....史國綱(七)

國際經濟合作中之貨幣金融.....孫九祿(一〇)

懷特戰後貨幣計劃與國際銀行計劃.....曾紀桐(一六)

美國之高度工業化.....湯德明(二〇)

工業救濟問題之檢討.....田文彬(二五)

縣官在政制史上的地位.....周蔭棠(二七)

一隋唐五代兩宋貢科舉.....曾資生(三〇)

請改實金為工讀金.....湯學耕(三六)

第四十卷 第四號 目次

二月星座神話.....陳蓮媿(三八)

汽車行駛方向應否改為左來右去?.....何乃民(三九)

蒙古伐金初期契丹人之投效.....余行邁(四二)

明紀輯略與朝鮮辨証.....王崇武(四五)

文學的時代.....姜蘊剛(四九)

藝術有用論.....王陵平(五二)

中國戰時戲劇創作之演變.....田禽(五三)

邱吉爾的雪茄煙.....許君遠譯(五七)

翠玉嫩指.....錢歌川譯(五九)

# 國際合作之前途

## 一 國際合作之演進

國際合作是人類進化過程中一種自然的趨勢。這種趨勢的原動力，在於人類天賦的本性；而這種趨勢的終極目標，便是「國父所期望的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人類爲使這種趨勢加速度進行起見，曾有不斷的努力，這就是我們所謂「國際合作運動」。我們現今仍在戰爭圈內，但是將來終有一天要恢復和平。將來的世界和平能夠維持到甚麼地步，就要看這個國際合作運動發展到甚麼程度。這是目前全人類的一大課題。

何以說國際合作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種自然趨勢呢？因爲合作是人類的本能，要求合作也是人類的天性。西哲亞理斯多德有言：「人類是政治的動物」，這便是說，人類生來就是合羣的動物，有合作的本能，也有合作的要求。所以自古以來，國際合作的事實，史不絕書。我國春秋時代的諸侯會盟，西洋古希臘時代的亞卡安聯盟 (Achaean League)，都是古代國際合作的顯例。

我們若就整個人類歷史來看，可以發見國際合作的演進，有下面幾種趨勢：

第一，在範圍方面，國際合作是由局部的合作逐漸演變爲全球的合作。在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以前，人類的世界觀念，只是局部的世界。中國人的所謂「天下」，僅限於東亞一隅。西洋人的所謂「國際社會」 (Family of Nations)，在十八世紀以前，也僅以歐洲國家爲限。自美國獨立後，「國際社會」中才有非歐洲的分子，十九世紀末葉後，「國際社會」才擴展到亞洲。前次的大戰，叫做「世界大戰」，

對受。且以所見。至試。或。中。國。國。際。合。作。之。前。途。陳世材

這次的大戰，在許多國外的出版物裏，便不再稱「世界大戰」，而稱「全球大戰」。國際合作的範圍是隨着這種觀念的擴展而擴展的。

第二，在方式方面，國際合作是由雙方的合作逐漸演變爲多方的合作，由臨時的合作逐漸演變爲長期的合作。古時國際合作多半限於雙方，即使同一事件涉及許多國家，那個發動合作的國家，也只知派遣多數代表，分別前往有關各國接洽，後來人類發明了利用國際會議的方式，於是國際合作由雙方的一變而爲多方的。但是，國際會議的召集，仍祇有臨時合作的功能。自一八七四年萬國郵政公會成立後，常設的國際合作機構才日見發達，於是國際合作的方式，又由臨時的一變而爲長期的。

第三，在內容方面，國際合作是由片斷的合作逐漸演變爲全面的合作。從前的國際合作，多半限於某些特定事件，例如萬國郵政公會，國際度量衡局等，都祇是某一方面的國際合作，這種國際合作，很顯然的，是零碎的，片斷的。自從國際聯盟成立以後，國際合作漸有概括一切的趨勢，現在世界聯邦之論，甚囂塵上，將來戰事結束之後，縱使世界聯邦不能即時實現，但國際合作總是朝着全面合作這一方向走，似可斷言。

以上三點，說明了國際合作的歷史趨勢。國際合作既有數千年的歷史，何以演變至今，國際社會仍在無政府狀態之下呢？這其中的道理，大有研究的價值。

## 二 國際合作之障礙

國際合作演進遲緩的原因很多，歸納起來，有下面的幾個重要原因

素：

第一，人性的缺陷。人類雖有合作的本能和要求，但在另一方面，人類也有自私的慾望，偏執的僻性，和猜忌的心理，合作是有時需要犧牲本身利益的，但是自私的慾望往往不肯讓步，合作是需要和衷共濟的，但是偏執的僻性往往不肯放棄己見，合作是需要坦白真誠的，但是猜忌的心理往往從中作祟。

第二，歷史的遺毒：歷史上有兩大勢力，阻礙國際合作的發展。這兩大勢力，一個是孤立主義，一個是帝國主義。我國從前的閉關政策，就是孤立主義的典型。十九世紀的英國，還高唱着「光榮的孤立」，現在的美國，孤立派仍未絕跡。這種孤立主義是國際合作運動的一大阻力。說到帝國主義，我們中國受害最深。簡單的說，此次大戰後，只要帝國主義存在一天，國際合作就有受阻的一天。

第三，政治的阻力：現代的國際政治，在思想上有所謂「主權至高」的觀念，在實際上，有所謂「一致同意」的原則，都是國際合作的障礙物。至於各國內部的政治組織，德日二國的獨裁制度，固與國際合作背道而馳，即民主美國的政制，也不免有妨礙國際合作的地方，例如美國批准條約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任何國際合作的方案，很容易給少數頭腦糊塗的議員所否決。這些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曾經直接間接的阻礙了國際合作的發展。

第四，經濟的矛盾：各國在經濟方面的衝突，也許是阻礙國際合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因。這點可從兩方面觀察，一方面是經濟的競爭主義，例如各國的關稅壁壘，進口定額，外匯統制，貨幣貶值等，都是損人利己的法寶。另一方面是經濟的自給自足主義，倘使各國真正能夠自給自足，當然便無須與他國合作。所以一切根據自給自足主義而來的辦法，如計劃經濟，統制經濟等，都是國際合作的暗礁。

因為有上面這許多重大因素的存在，所以國際合作雖有幾千年的歷史，至今仍在很幼稚的狀態之中。這次大戰以前，國際聯盟及其附屬機關，可說是國際合作的最高造詣。但自中日開戰以後，國際聯盟

便奄奄一息，名存實亡。從歷史上看來，國際合作的進展，往往呈線型的。

### 三 國際合作之現狀

在現階段裏，戰前的國際合作機構已經沒有多大作用了。但聯合國方面，為求共同勝利和永久和平起見，現有下列各種的合作：

第一，全體聯合國的合作：全體聯合國簽訂了或接受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的大西洋憲章和一九四二年元月的二十六國宣言，這是規定聯合國全體合作的基本原則的文獻。去年聯合國先後在美國舉行了國際糧食會議，和聯合國救濟善後會議。這兩個會議的決議案，都有常設的機關來執行。

第二，多數聯合國的合作：最顯著的是歷次的羅邱會議，中英美的魁北克會議，英美蘇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及中美英開羅會議，英美蘇德黑蘭會議等。其次是各種作戰機構，如太平洋作戰會議，中東供應中心，澳洲聯合國供應委員會，以及各戰區的統帥部等，都有多數聯合國參加，通力合作。此外，各佔領區，如北非、西西里、義大利南部等處的行政機構，及美聯防制度下的各種機構，也都是多數聯合國參加的。

第三，聯合國雙方的合作：聯合國雙方的合作，現在以美國為中心。美國利用互惠商約，已與大多數中南美國家取得聯繫，她又利用租借法案，與將近四十個國家發生了雙方的合作。現在，美國與英國合租的合作機構已有七個，與加拿大合租的合作機構，也有四個之多。此外，英蘇的軍事同盟，亦很值得注意。依照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的英蘇協定，英蘇兩國不但應在戰時合作，而且將在戰後合作二十年。

莫斯科會議的結果，中美英蘇四國聯合宣言發表，更為聯合國在戰時及戰後的合作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四國宣言將為全體聯合國家所接受，已可預見。至於擬議中的國際合作機構，各聯合國的朝野人士

都會發表許多意見。在最近期間，有實現的可能者，莫如去年四月美國和平組織研究會第三次報告書中所提議的幾個合作機構，即設立（一）聯合國貨幣組織，（二）聯合國經濟組織，（三）聯合國物資局，（四）聯合國開發局。這些機構目前雖僅包括各聯合國，將來不難變為全世界的國際合作組織。『蘇聯對華宣言』與『德蘇協約書』中，均對國際合作前途，有極詳盡的論述。

#### 四、國際合作之前途

說到國際合作的將來，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中美英蘇四大主要聯合國對於國際合作的基本態度。全世界全人類，自自由民主，又據現在，先說美國：美國自華盛頓總統的臨別贈言以來，孤立主義籠罩着許多人民的心理。但是歷史告訴他們：前次的世界大戰，曾經把美國捲入了戰爭的漩渦；這次的全球大戰，也使美國「在獨裁的沙漢中無法取得民主的水草」，終至被迫參戰，所以大多數美國人民都知道「孤立主義已經死了」。美國參議院所討論的康納利案，便是美國永遠放棄孤立主義，參加戰後國際合作的徵象。這議案已經衆議院通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也已以二十二票對二票的絕大多數通過了。

但是，縱使參議院順利的通過了康納利案，我們認為仍不能十足保證美國的參加國際合作，因為（一）美國的國會，今天可使孤立主義死，明天亦可以使孤立主義復活。著名的美國中立法案，是由美國國會所制定，也是由美國國會所廢棄的。（二）美國的孤立派迄未絕跡，任何國際合作的方案，均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的批准，這些孤立派參議員很容易阻礙美國參加國際合作的行動。（三）共和黨是美國兩大政黨之一，現在共和黨內部紛雜，羣龍無首，對於許多重大問題，都無決策；若下屆的美國總統為共和黨人所得，將來的政策如何，殊難逆料。不過，現在孤立主義已經不能算是阻礙美國參加國際合作的重勢力，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種新興的勢力，這個新勢力可以叫做「新帝國主義」。現在有些美國人相信，美國的力量，已經到了可以左右世界政治的地步，要造成一個美國人所希望的新世界，只要運用美國

的單獨力量便行。所以現在美國輿論上的爭辯，不是前次世界大戰後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爭，而是新興帝國主義與國際合作主義之爭。美國對於將來國際合作的態度，將取決於這兩種主義鬥爭的結果。其次，說到英國：英國是受議會政治的薰陶最久的國家，各黨派對於同一事件，很少一致的見解。大體而言，勞工黨是趨向國際合作主義的，保守黨裏的人則多少還是憧憬着維多利亞時代的光榮。在這次大戰中，英國所表現的合作精神固然很好，但是戰前國際合作的失敗，英國又何嘗不要負責？不過，這次的大戰給英國的教訓太大了，一般遠見的英國人都知道孤立主義是不可能，帝國主義是無用了，所以英國將來積極參加國際合作，當不致成爲問題。

再次，說到蘇聯：蘇聯的共產主義本有世界性和排他性，很不宜於國際合作，但自史太林主張共產主義國家化後，無論在理論上，或在事實上，蘇聯已經可與資本主義國家並存合作。當歐洲風雲緊急之時，蘇聯毅然加入國際聯盟，這便是蘇聯趨向國際合作的一大步驟。去年第三國際宣告解散，這又是蘇聯放棄偏執已見，準備參加國際合作的另一重大步驟。不過，共產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國家始終不免猜忌之心，將來除非美國積極參加國際合作，蘇聯對於歐洲問題必定不肯讓步，而採「獨善其身」的政策，造成一個經濟自給自足的單位。

最後，說到我們中國：中國從前雖曾採取閉關政策，但是舊日的孤立主義，早已給帝國主義者打破，現在的中國人民，再沒有相信孤立主義者了。孔子的「大同主義」，也許受了他的「尊王攘夷」政策的限制，但是國父的大同理想，既沒有人種的歧視，也沒有地域的限制，三民主義的最後目標，就在「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民國元年，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便宣言「願與世界友邦攜手合作，以增進人類幸福於無窮」。我們的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也屢次以中國願與世界各國和平合作的決心昭告中外，中國不願恢復從前的閉關主義，也不願承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衣鉢，而將以平等的精神向國際合作的大道邁進。現在的中國，可算是世界上最忠實最熱誠的一個國際

合作主義者。……

中美英蘇四個主要聯合國家對於國際合作的基本態度，大體看來，都很可樂觀。而莫斯科會議更爲未來的國際合作奠定了堅固的基礎。不過，天下事不宜過分樂觀，也不宜過分悲觀。國際合作的前途如何，仍要看下面幾個問題能否圓滿解決：

(一) 人種的偏見，自私的心理，是否可以完全化除？倘若不能化除，又是否可以設法控制？

(二) 孤立主義與帝國主義是否可以完全消滅？消滅之後，又是否可以設法防止其復活？

## 當前世界政治的主流

亨利會在他的「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一書中，對德國問題作這樣的預言：「問題只是：這兩個前途那個首先到來，戰爭或者革命？無論如何，第一個最後要轉變成第二個。」如果把它轉引到這幾年的世界問題上來，將也還是一個正確的先見。

現在，我們所進行着的，已不是帝國主義的爭霸戰，也不是只限於保衛一國權利的戰爭。它是保衛全世界人類的自由和民主，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威脅和奴役的戰爭。它應該正如威爾基在「天下一家」中所說，是道地的「人民的戰爭」。

通過這個進步的戰爭，世界的面目已經有了不小的改變。英國名政論家拉斯基教授，在以「新建設之性質」爲題的對華播講中，解釋這次戰爭是一種「偉大的社會革命」。的確，我們現在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時期，「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實，不是我們處在一個戰爭中，而是我們處在一個革命中」（引自朱寧·赫胥黎之「論生活於一革命中」一文，原載一九四二年九月份「哈甫斯」Harper's雜誌）。這

(三) 各國的政治制度能否滿足國際合作的要求？國際組織有無適應新環境的能力？

(四) 各國的經濟矛盾怎樣去解決？各國的利害衝突怎樣去調和？

(五) 英美的民主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中國的三民主義，用甚麼方法可以取得協調？

倘使人類能從這次的全球大戰裏，找出適當的方法來圓滿解決上面幾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則國際合作的前途，必定光明遠大。我們大家都得要用一點腦筋，去想想辦法，來推進這個爲全人類謀福利的國際合作運動。

### 戴文葆

革命的具體內容是世界民主主義的發展和昂揚，這革命的最後目的是：「要創造一種和平，這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德黑蘭三強宣言）。而法西斯主義是以反對民主與和平起家的，墨沙里尼說過：「法西斯主義是要和一切民主主義的意識作鬪爭的」；「法西斯主義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與實用性」。所以，澈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就是這革命的偉大行動。

當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本有兩條路線向全世界提示着，而其中威爾遜總統給我們的是戰前秩序的恢復。在國內，他主張民主主義的改革，但仍保存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獨佔生產工具的要素；在國外，他承認民族自決的原則，但仍保存殖民地統治；他贊成世界和平的目標，卻將敵對的帝國主義的主權，放置在鬆弛無能的國際聯盟裏。可是，威爾遜總統並沒有引領我們走上和平的坦途。戰後分贓的條約，播下了今日戰爭的火種。「十四條」祇是歷史上一個文獻而已。

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在芝加哥的「建立和平委員會」中，解說得頂透切。他說：『其原因完全是我們對於全世界平民的困苦情形，還不十分關切。我們還沒有認識經濟上的民主必須與政治上的民主，配合一致』（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訊芝加哥九月十一日電）。換句話說，就是發生戰爭的經濟結構沒有改革。二十年來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經濟關係，是這次戰爭的淵源，也就是說，狹隘的民主主義絕不能建立真正的和平。

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爭中發展和昂揚的世界民主主義，它必須是把狹隘的民主主義擴大了範圍，普及於『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在國內，擴大為全國人民間的民主；在國外，擴大為各國民族間的民主。對內民主，國內方可和平；對外民主，國際才有和平。這兩者是相互影響，而前者決定後者的。

世界民主主義，在對內，它的核心精神是羅斯福總統所倡導的四大自由，『有言論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每一國家的人民，均應享受。『法西斯主義以及所有的惡勢力和流派，必須澈底消滅』（莫斯科會議所發表的『關於意大利的宣言』）。這就是實行『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全民政治，『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民權主義演講），為人民所運用。今後，正如華萊士所說：『領導世界，有賴於福利政治的多，有賴於權力政治的少』。這福利政治，一定是建築在絕大多數的民意之上，一定是以人民的視聽為視聽，人民的利害為利害。所以，不但那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專制，應該剷除，就是那『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孫中山先生語）的狹隘的民主，亦應改造。在對外，它的核心精神是大西洋憲章所標榜的民族平等，『尊重一切民族在所居處的本國內，有權選擇他們的政府形式，凡以武力壓迫而失卻的主權和自治權，將予恢復』；『（英美及所有盟國）不願違反有關係的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願，而作任何領土上的變更』。每一民族的成員，均應享受。這就是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達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

等的目的。因此，這個開明的決定，無論怎麼說，它不應限制於一個地域，威爾基說得好：『全世界民族皆須自由平等』。任何民族由別的民族去統治，這不是我們戰爭以圖保持的制度。所以，不獨法西斯主義的荒謬的『種族論』，應該根絕，就是那造成近代最血腥的戰爭的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也應摒棄。倘若在戰爭進行中，或結束後，反法西斯陣線中，和所有的國家，竟仍有被剝奪或漠視其自由與平等權利的人民或民族，則這個人民戰爭便將失去其光輝的意義，而勝利的獲得也將受到阻撓，縱使倖而獲得，仍難免播下再戰的種子。

因此，必需具備保障這對內自由對外平等的世界民主主義實現的物質基礎，那就是經濟上的民主與政治上的民主配合一致。所以，華萊士在美國底特律城對民衆團體講演時謂：『目前兩條路線由我們選擇，『我們的選擇，是在大家的民主和少數人的民主之間任擇其一；要就是把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機會散佈給一切人民，要就是把我們的豐富的資源集中在自私和貪婪的人們手裏』（原載七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這偉大的選擇，它本身就是一個革命行動。這行動不但影響戰爭的結局，而且更決定戰後的世界。

我們必需慎密的選擇，以創造保證永不發生戰爭的世界，決不能又把血的澡盆遺留給我們的後裔。『我們企求的和平，並不是舊暴君逝去，新暴君成立之間的曇花一現的和平』。華萊士這樣地警告我們：『我是信任我們民主的資本主義的制度的，但我所信任的資本主義必須是富足而大家有職業的資本主義，假如我們回復到一九一九到一九三二年所產生的那種使人貧困的資本主義，那麼我們一定可以預料，戰場上回來的兵士們和停職的軍火工人們會說些什麼，是很難說的了』（同前引）。因此，『當我們對奴役人類精神和靈魂的戰爭，以勝利者的資格放下武器的時候，就要馬上拿起武器，進行對抗飢饉失業和壟斷世界市場的戰爭』。可是，這並不是說，這兩種戰爭是無關聯的，它們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忽視的；然決不是平行的並行，而是

有先後的相互主從的關係。如自其的頭。...

有了『富足而大家有職業』，使人人『免於匱乏』的經濟上的民

主，國內和平方可實現；而國際和平必『有賴於經濟國際主義之實

施』（威爾基語）。這樣，世界民主主義的原則才不致落空。人類的

禍患，才可以免除。威爾基去年訪問盟邦歸國後，在對人民的廣播文

中，就道破了這個道理：『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所有的人民，必須獲

得政治與經濟的自由，這樣才有和平的存在』（載一九四三年十月二

十七日先鋒論壇報）。...

這世界民主主義的基本精神，是和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

主義的基本精神相吻合的。因為『三民主義是一貫的，一貫的道理

就是在打不平。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

的，民生主義是對富人打不平的』（總理全集三、三四九頁）。這就

是說：民族主義是對外的民主主義，民權主義是對內的民主主義，民

生主義是民主主義的核心。我們面對着當前的人民戰爭中發展和昂揚

起來的世界民主主義，更深感孫中山先生的天才的卓見是不滅的真

理。

從大西洋憲章，二十六國宣言，到三國會議的決定，開羅會議的

決定和德黑蘭會議的宣言，這世界民主主義的精神像一根紅線一樣地

貫穿在其間。它是國際團結爭取和平的基礎，也是反法西斯國家國內

政治的基礎。人們往往忽視後者，我們應該看到二者之間的聯繫，只

有切實推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才能真正促進國際間的和平合作。因

為，一國的對外政策，是從它的政治經濟結構中生長出來的。人民戰

爭勝利的目的是非『談判的和平』，是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即以

真正民主的和平來結束這次戰爭，這戰爭才能給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

數的人民以幸福。惟其如此，當行普遍的擴大的世界民主主義，才是人

民戰爭勝利的保證，才不蹈第一次大戰的覆轍。

所以，世界民主主義必須在世界的規模上實現。只有世界的民

主，才有人民戰爭的勝利，才有世界的和平。從世界民主主義的原則

來說：自由的世界，不能一半是主人，一半是奴隸；民主絕不可分，

平等的世界，不能一邊是天堂，一邊是地獄；和平絕不可分。明天世

界的和平，決定於今日世界的民主。為了人民戰爭的勝利，為了澈

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建立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德黑蘭

三強宣言），具體實現民主主義的原則是所有反法西斯國家的當務之

急。

威爾基說：『此次殘酷無情的戰爭，是對我們的一個教訓，整個

世界不得不在勝利與淪亡，自由與法西斯主義中作一選擇，並沒有所

謂純粹的局部問題。』今天我們所要解決的，不是那『國家的問題，

是一個世界的問題。具體實現民主主義的原則，也是沒有那一個國家

可以例外的。因為全世界的人民，不僅要求政治上滿意的自由，並且

還要求着經濟上的進步。世界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的主流。『世界潮

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

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而定向東的，無論怎樣，都

是阻止不住的』（民權主義第一講）。

世界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的主流，是人民戰爭勝利的保證，是這

個『偉大的社會革命』的具體內容。祇有它，才能『消除暴政和奴

役，壓迫和苦難』（德黑蘭三強宣言）。『世界祇有一個前途，便是

正義與自由民主的澈底勝利』（蔣委員長於七七、六週年紀念日告

聯合國民衆書）。它必須實現，它一定要實現的。



# 蘇波疆界問題

## 史國綱

一九四四年開始時最使人感覺到興奮的軍事發展，就是四月四日，伐杜丁將軍麾下第一烏克蘭軍在基輔西北區域，攻入未淪亡以前波蘭的國界；非特使聶伯河曲的德軍，更陷於危境，並且把希特勒的歐洲堡壘，又打開了一個從東方進攻的門戶。在這種情形之下，德方軍發言人也不得不承認：「德軍不因維持威望而堅守其在蘇聯之佔領區。德軍雖被迫退出蘇境，亦在所不惜。蓋與掌握全線相較，尙屬次要問題。」到處捉襟肘見的希特勒，自料必難逃過今年。而蘇聯對於剷除歐洲侵略惡勢力的供獻，亦將永久彪炳於後世。

但是這個可喜的事實，卻使去年一度緊張的蘇波關係，復因疆界問題而趨於尖銳化。翌日（一月五日）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就舉行閣議，討論這樁事情，並發表聲明云：「希望蘇聯能尊重波蘭共和國及其公民之權利。波蘭政府曾訓令抗德之秘密運動繼續，並加強對德之抵抗，避免與前進之蘇軍發生衝突。」又說：「波蘭在此次戰爭過程中之行動，可證明其向未承認，且不願承認由武力所作之解決。」意義明顯，當然是爲了日後要求恢復東方原有疆界而說的。這引起了一月十日塔斯社所發表的蘇聯政府正式的聲明，全文如左：

「一月五日在倫敦發表了波蘭流亡政府關於蘇波關係的聲明，其中含有若干錯誤的武斷，包括關於蘇波邊界的錯誤的武斷之辭。由大家大家都知道，蘇聯憲法遵照一九三九年經由普遍的民主基礎上進行的全民投票所表示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民衆的意志，已確定了蘇波邊界。烏克蘭人口絕大多數的西烏克蘭的領土，亦就併入蘇維埃烏克蘭，而白俄羅斯人形成絕大多數的西白俄羅斯的領土，就併入蘇維埃白俄羅斯。曾經強使蘇聯接受的，跟居住在

西烏克蘭的烏克蘭人和居住在西白俄羅斯的白俄羅斯人有關係的，一九四一年前里加條約所作的「不義行爲」，因而矯正了。波蘭的領土，而且反爲波蘭人民和鄰人——烏克蘭人民、白俄羅斯人民、以及俄羅斯人民——之間的堅定永久的友誼，創造了可靠的基礎。蘇聯政府曾一再聲明：牠贊成再建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波蘭，贊成蘇波友好。蘇聯政府又聲明說：牠力求在堅定的善鄰的邦交和互相關心的基礎上，而且如果波蘭人民這樣願望的話，就在爲反對波蘭作爲蘇波主要公敵的德寇而締結的互助同盟的基礎上，建立蘇波友誼。波蘭如加入蘇捷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對於這種任務的達成就會有所貢獻。

蘇聯軍隊在蘇德戰場上博得的成就，一天天加速蘇聯被佔領區從德寇羈絆下獲得的解放。紅軍自我犧牲的奮鬥，以及我們盟軍正在對展開的戰鬥行動，使希特勒作戰機體的徹底敗北越來越近，而使波蘭和其他國家就要從德國佔領軍羈絆下獲得解放了。

蘇聯軍隊對德軍作戰的波軍師團，已經在這種解放戰爭中貫徹他們光榮的任務。波蘭因蘇聯軍隊而獲得的自由，蘇聯軍隊目前，正爲波蘭作第二個強大而獨立的國家的再生展開着可能性。然而波蘭不得由佔領烏克蘭的和由俄羅斯的國土來再生，而應把自古以來就屬於波蘭卻被德寇從她的系中扭奪了去的國土歸還波蘭，而再生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夠在波蘭人民跟烏克蘭人民、白俄羅斯人民、以及俄羅斯人民之間建立友誼和友誼。

「波蘭的東疆是能夠由和蘇聯的協議來確定的。蘇聯政府並不把一九三九年的疆界視為不可變更。這些疆界能夠以對波有利的形式加以修改，以便波蘭形成大多數人口的區域，轉讓給波蘭去。在這種場合，蘇波疆界再能大致依照所謂寇松界線。那是一九一九年由同盟強國的最高委員會通過的，那種界線就規定把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併入蘇聯。」

「波蘭的西疆必須擴張，把德寇先前扭奪了去的古波蘭國土併入波蘭。沒有那片國土，就不可能把全體波蘭人民團結在它的國家中，那個國家將要獲得通往波羅的海去的必要的出路。」

「波蘭人民熱望完全重新團結在強大而獨立的國家中，這種正當的抱負應該予以承認和支持。」

「跟人民絲絲的波蘭流亡政府，已證明了沒有能力和蘇聯建立友好關係，牠並且證明了沒有能力在波蘭本土組織對德寇積極戰爭。不但這樣，牠更由於牠的錯誤政策，數見不鮮地幹出使德國佔領軍得利的勾當來。」

「然而，波蘇的利益是在於我們兩國間建立堅定的友好的關係，在於波蘇兩國人民在對共同的外來敵人的鬭爭中團結起來，那是所有一切盟邦的共同事業所要求的。」

這個聲明不但表白了蘇聯的態度，並且也解釋邊界更改的經過情形。但是有幾點是需要補充的。(一)波蘭的復國雖始於一九一九年，不過她的最後疆界，尤其是東部的，數年之後方才定奪。那時波蘇之間，發生戰爭。一九二〇年秋季，紅軍長趨直入，兵臨華沙城下，後來經過維斯杜拉之役，波蘭轉敗為勝。結果簽訂里加條約，改變巴黎和會中最高會議所決定的「寇松界線」，向東擴展，包括一部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而成立波蘭流亡政府認為應有的原來疆界。(二)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派大批陸空軍，進攻波蘭，勢如破竹。九月十七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否認波蘭的存在，而為了保護該境以內同血統的人民——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亦派大軍西進，未遇劇烈

抵抗。德蘇兩國在波蘭中部會師後，於九月二十八日簽訂莫斯科協定，平分波蘭國土。於是蘇聯把所得到的土地，如聲明中所云，復併入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因此顯然不承認一九二一年所定的疆界。這兩個疆界之間，面積約七萬五千方哩，居民窮困，大都從事耕種；除加里西亞所產的石油和拔力斯托克的紡織工業之外，並無其他經濟上重要的企業。波蘇因疆界問題而爭的土地，就是這一片。

波蘭本來是一個大國，疆土北自波羅的海起，南迄黑海止。但是經過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年的三次瓜分，以及一世紀多這樣長時期被統治的情形之下，她歷史上的疆界和目前民族的疆界，自然是不會相符的了。所以對於一九一九年波蘭的復國，雖然贊同，但是她版圖的劃定，顯然欠妥。例如波蘭走廊的存在，不但合理，並且也決不會持久，更是釀成國際糾紛的因素。而在波蘭的總人口中，少數民族卻超過三分之一。尤其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蘇聯所分割的區域裏，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約有八百萬，猶太人一百三十萬，波蘭人祇有三百五十萬；可見那兒許多地方，實際上波蘭人必佔少數。根據威爾遜總統所倡議的民族自決的原則，這也是大西洋憲章所製用的，波蘭的疆土似乎有重新調整的必要。再進一步說，假使波蘭治理少數民族，成效顯著，那末波蘭在這次戰後繼續要求管轄，可得主持正義者的同情。雖然波蘭在條約上有保護少數民族的義務，但是波蘭是否履行這種的職責，又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就是對於自己同種的人民，波蘭政府恐怕也沒有盡應有的努力。從以上各方面看來，波蘭實難堅持其立場。

還有，波蘭立國以後所採取的政策，不免基於錯誤的觀念上。依常理而論，她祇有實施睦鄰政策，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然而被人利用，一方面自認為阻擋共產主義的屏障，另一方面擔任包圍德國的職務。因之對於東西二鄰的蘇德，始終沒有樹立真正友善的邦交。到了希特勒得勢之後，更被其狂言所眩惑，甚至於有贊助希特勒東進政策

的趨向。一九三五年一本流傳極廣的書裏（名爲「波蘭的政治目標」，係斯都尼基所著），就很坦白地說：「日本擊敗蘇聯，波蘭卻有很大的裨益。假使波德爲了（分割蘇聯西部）的共同觀念而成爲同盟，那末波蘭便有參加日蘇戰爭的可能。法國在事實上已成爲一個二等國，不必考慮到她的態度。波蘭和德國就能夠建立中歐的強大集團。」而政府方面的發言，也不時流露這種的意志。到了希特勒的野心已經十分明顯，英法派了參謀團到莫斯科商談軍事合作的時候，當蘇聯提出借道波蘭以攻德的建議，波蘭仍舊不立即予以同意。即以德軍佔領下的情形而論，波蘭祕密運動協助德方，反有阻礙蘇方的嫌疑；否則波蘭流亡政府的聲明，不必特別提出已訓令「避免與前進之蘇軍發生衝突」，同時華盛頓和倫敦方面，也不會發生波蘭祕密運動和前進蘇軍難於合作的顧慮。這些又可見蘇聯聲明中不願以波蘭流亡政府爲交涉的對象，頗有理由。

至於蘇聯在聲明中所表示的態度，相當誠懇。（一）蘇聯希望波蘭人民重新團結而成立一個強大和獨立的國家，能夠和蘇聯合作，對付共同的敵人。（二）經過全民投票而併入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的土地，固然難於更改；但是蘇聯政府並不把一九三九年的疆界，視爲不可變動。這部份疆界能夠以對波有利的方法，加以修正，以便波蘭人形成大多數的區域，轉讓與波蘭。這種未來的疆界，大致可依照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最高會議所決定的「寇松界線」。（三）波蘭應把自古以來就屬於自己，卻被德國所奪去的土地（指東普魯士），設法歸還，而圖再生。這樣，波蘭仍舊是一個大國，有通波羅的海的出路，還避免走廊的存在。（四）蘇聯歡迎波蘭參加去年年底簽訂的蘇捷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根本調整波蘇關係，建立波蘇之間可靠的友誼。這些一方面宣佈交涉之門，並未關閉，另一方面指出波蘭能夠獲得最完滿結果的路徑。

這樣說來，波蘭流亡政府爲波蘭的前途計，似應捐棄前嫌，改變態度，最低限度先和蘇聯樹立友善的關係，有願意互助互惠的精神，

以便來日在疆土方面得到最完滿的解決。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該參加蘇捷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在該約附件中的議定書裏，蘇捷雙方都明白表示，歡迎波蘭參加，因此這可說是毫無問題的。從捷克斯拉夫總統貝尼斯由莫斯科抵達開羅時所發表的談話中，我們知道，在戰後蘇捷將有共同的疆界。如是波蘭對於蘇捷，更有維持友好邦交的必要。波蘭使蘇捷條約成爲三方面的協定，實在是一舉兩得。而且去年斷絕的蘇波邦交，可以立刻恢復，免得聯合國之間表面上也有不聯合的現象。其次，波蘭流亡政府當發表聲明，願意把疆土問題，留待戰後作最合理的解決。這是最光明正大的態度，可得各方面的贊許和同情，而事實上決不會對波蘭有任何害處的。並且聯合國之間或有的嫌隙，不至於愈趨嚴重，而可逐漸冰釋。否則解放了一個區域，就發生疆土的爭執，對於勝利及和平，將有莫大的阻力。理由明顯，毋須贅述。

當紅軍越過波蘭舊界的時候，就有波蘭總統擬前往華盛頓，要求美方表示對於波蘭疆界態度的傳說。而在蘇聯的聲明發表之後，又有波蘭已請美英調處的消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根據下列的原因，我們認爲美英對於波蘭的申請，除表示願意接受和考慮，並設法調解波蘭關係外，不見得會有進一步的舉動。

第一、現在的時期中，在戰事方面，爭取勝利，最爲重要。凡是足以遲緩勝利的降臨，或削弱擊潰軸心國的任何事件，都不應該發生。聯合國之間疆土的爭執，顯然是其中之一。那末英美對於波蘭，除乘機促進蘇波的關係之外，怎樣會有支持波蘭立場的主張。

第二、在和平方面，奠定四主要聯合國的密切合作，尤爲必要。由於莫斯科、開羅、和德黑蘭三個會的成就，已建立可靠的基礎；而地中海委員會和歐洲顧問委員會的成立，更使美、英、蘇之間對於歐洲問題的處理，有更進一步的聯繫。這種情形是不容易創立的。美、英該不會有任何舉動，使已實現的復歸於消逝。

第三、戰後世界版圖的劃分，是整個的問題，應該通盤調整。侵

哈爾濱佔領區未完全解放之前，似不宜詳細決定，徒然引起無謂的糾紛，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造成的錯誤。作者認為「怎樣劃定戰後的世界地圖」(見本刊第三十九卷第二號)一文中的建議，乃是最合理最徹底的解決辦法。波蘭在這時單獨提出要求，顯然難於獲得嚴重的注意。

第四、表面看來，這問題和波蘭的主權有關，波蘭流亡政府不該輕鬆放過。但是依照前文的檢討，該區域應否仍屬波蘭，卻是疑問。即使感情用事者，知道了這種實情，也不見得會過於偏袒波蘭。這樣，波蘭流亡政府對於美、英，該不至於有過奢的希望。而以為波蘭流亡政府的立場不適宜，也並不是長強凌弱，認強權為公理。波蘭所以權衡輕重，根據事實，必如美、英觀察者的猜測，美、英政府洵不至於。因此雖然波蘭並不出正式申請，其間始人。(一)雖然全列對波蘭而得人，但波蘭與波蘭人，其間始人。

## 國際經濟合作中之貨幣與金融

府對於這事不會有直接的表示。何況蘇聯與美、英之間，向來有一種不易趨於接近的觀點：就是在蘇聯目光中，美、英常偏重傳統的而不是真正代表多數人民的政府，把這種政府作為交涉的對象。這是由於美、英素來重視法統，蘇聯注重實際，各有各理，是非難斷。但是最近情形轉佳，這種分歧的意見已漸趨消滅。努力於爭取勝利及創立和平的美、英，當不願為了這事，而能擴大舊有的裂痕。波蘭、總之，美國國務卿赫爾自莫斯科返國後說，波蘭一切有關疆界與領土的問題，必須待諸戰後解決。目前決不能因為疆土問題，而就停止作戰。這是絕對不錯的。至於聯合國共有的態度，始終是對於打擊軸心國家的，都認為沒和其作戰最力的原則視為良好。深願波蘭流亡政府予以注意。不見得會自取一途的舉動。

## 金融

使全世界均蒙受重大損害，而受害最烈者還是那使用經濟戰中最有力武器且尋取最大限度的國家。此種國家不獨基於經濟上之理由，且用作為政治上的補助，而進行大規模的擴軍計劃。提出為大砲犧牲牛油

戰前，各國的貨幣都非非常紊亂。從戰時所遺留之種種經濟上的限制和各國風起雲湧的保護貿易政策束縛了國際貿易。許多國家的生產解體，許多國家因無力償付國際債務致演成財政上的破產，於是整個世界陷入於經濟上的厄運。如是者十年，終於造成不景氣時代的降臨，且表現着有史以來從未那樣的劇烈和長久。接着，全世界又轉入於劇烈的經濟戰爭。許多國家因欲保持其通貨的穩定與財政上的償付能力起見，對於進口貨品施以嚴格且廣泛的限制，而對於出口物品則採取各種不合理的方法。如關稅壁壘，貶低幣值，限額，禁運，統制匯兌，複數幣制，津貼制等種種經濟戰爭的武器都被採用。於是雙方亦採取同樣方法為報復手段。此種經濟戰之結果，雖

加劇。演變到極點，終於釀成此次世界大戰的慘劇。戰時問題，戰爭環境之下，各種經濟戰略勢必未為加強，甚至不斷產生新的經濟戰武器，此仍不能避免之現象。因經濟戰及現代戰爭中整個軍事力量中不可分離的部。但戰爭結束之後，倘不能採取決定性的行動，消滅各種造成經濟戰的因素，建立經濟和平，則全世界人類所將遭遇之經濟痛苦，必較諸主戰戰後的情況尤為悲慘。可以斷言。戰後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總統羅斯福與英首相邱吉爾簽訂之大西洋憲章第五條，明白提出希望促成世界各國在經濟方面之全面合作。

以提高勞力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全。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聯合國共同宣言對於此點亦加以重申。可見各國政治家都覺悟到戰後各國如果無全面經濟合作為基礎，則在任何情況之下，政治和平仍不能免除危險。

## 貨幣與黃金

談到全面的國際經濟合作，千頭萬緒，而貨幣則為一切經濟行為的工具，故穩定戰後世界通貨，遂成為國際經濟合作全面的先決問題。所以美國業經於四月間召集聯合國舉行非正式貨幣會議，希望在戰事結束之前即能成立戰後貨幣匯兌與平準協定。在以往自由市場的貿易體系之下，許多國家的國際收支不能平衡，匯率波動頻甚，凡屬於逆勢的國家勢必輸出黃金並通貨貶值，結果金本位制度脫羈，市場波動無法限制，此乃此次戰前整個世界所遭遇之事實。吾人如欲於戰後決心解除匯兌波動之痛苦，必須廢止舊的金本位制，建立一新而單純的國際通貨單位，充作實施穩定一切通貨之工具。欲建立此新制度，當然必須各國訂立一政治協定，確定此種國際通貨在實際價值上的價值，以及其在匯兌市場上支持此協定價值的經濟工具地位。

吾人從國際通貨問題必聯想及黃金，因世界許多國家之通貨通常均用黃金定其交換價值。回憶金本位制度於前次世界大戰發生時崩潰之後，金屬幣絕迹於各國，市場上實際流通者均為紙幣，票面上雖因人民心理關係印有憑票兌付字樣，而實際上已絕無兌現者，均採用通貨管理制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間金本位制之部分的回復，亦參以管理因素，較諸以前之金本位實已變質，不過基於積付實物的瞭解而已。一九三一年各國再度放棄金本位制，於是黃金準備之貨幣觀念不再適用，在國際經濟橫的廣大的目的上，不過以黃金充作國際間清償比價之用。現在美國握有全世界黃金儲藏量的五分之四，如此繼續下去，黃金的功能將無法發揮，不獨從此不能再見黃金回其貨幣舞

台，且將無法可使國際政治趨於穩定。即使美國願將現存黃金作為禮物重行分配與以前所自來的國家，然而戰前的經濟實況如仍繼續存在，恐不久黃金必又回到坎特基城下，決非一種好辦法。何況各國未必願依賴美國之此種寬宏大度，而感覺到需要一種比金本位更好的制度。此次大戰爆發之初，各國於不得不用黃金換取美國的援助品之際，黃金還有地位，自美國租借法案實施後，此種借勢已經改變；至美國參戰以後，簡直不復存在矣。雖然，十年以來世界各國曾將每年黃金產量盡量提高，在以往之經濟與貨幣制度中，新出產之黃金雖不和諧，而尚有其動力性之特點；但全世界黃金之產量不過財富儲藏額的百分之五，所以其動力性頗有變為奢侈與強豪的趨勢，在某種場合或有限制出產的必要。何況現存黃金之不合理分配存在一日，金本位制度即無回復希望，此種不合理分配狀態繼續存在一日，黃金之功能亦無從發揮。故在新的經濟制度建立以後，必需有新的貨幣制度相配合，屆時黃金恐未必再能維持其以前地位，即充有力融通工具，信用與經濟政策主要相標的媒介之地位。戰爭結束後，國際貨幣制度既有建立之必要，黃金勢必自然消失其領導與操縱世界金融之主要因素。惟黃金仍保有其本身形體上的優越及心理上的重大價值，決非世界從此棄黃金不用，國際通貨單位的價值可以定黃金規定其價值，但並不說是用硬幣或紙幣發行，而在各國間流通，可以持之在店舖中購買物品。各國仍保持其本國之通貨，國際通貨單位不過在國際聯合平準基金或清算聯合中用作計算匯率與清償債務的單位媒介工具而已。

## 匯率的穩定

吾人於複雜的經濟體系中最感煩惱之事，當為國際匯兌。從個人在世界各地旅行之經驗，莫不了解到匯率變動所加予吾人之痛苦，甚至於可能使金錢因匯兌的差率而化為烏有。商人與銀行家則大半投機於貨幣單位本身之相對價值，而對於在當商業務變遷時，當

個商業行為集中於貨幣匯兌的投機時，國際貿易即陷於困難，此尚為正當之後果。倘發生經濟紛擾與財政危機之際，則匯兌波動之壓力足以誘導一切不幸與繁竇，而國際投機家則為其本身利益操縱市場，使資金大量的不正當流動，而匯兌的差額勢必愈大而愈不能平衡。

某一國家為增加輸出減少輸入起見，必合法的實行通貨貶值，其他國家為適應此種通貨貶值的競爭，遂推翻一切通貨的穩定，終而無一國能得利。全世界盡受其害，何況匯率之故意變動會被利用充作一國改善其在國際經濟上地位的競爭手段。此種手段當然違反國際間自然利益與相互利益之原則，阻塞資金之有益流動與國際貿易。充其量在一兩個國家之間締結雙方通貨休戰協定，能穩定一二國家間之匯率，但於整個世界之通貨穩定仍無濟於事。

吾人倘能理解匯率不穩定對於國際經濟政治之影響，則在戰後利用單純的國際通貨單位以穩定各國通貨，藉以消除匯兌波動，乃一顯然合理之舉措。屆時，不論美元英鎊盧布法幣以及其他各國的通貨均可用此國際通貨單位共同協定一比值，於是各國之通貨亦將彼此等比，而後國際匯兌率遂不復再有發生重大波動之慮。

國際匯率一經協定之後，即各國將其本國通貨價值相等於若干國際通貨單位以後，除非某一國家發生不能預料之變化而有申請調整匯率之必要，再與各國協商同意，無論何國均不能任意變更其匯兌率。因此參與此一國際貨幣協定之各國必須對於所有其他各國的匯兌予以合理的制限或統制，除非某一國家有特殊原因，必須遏止資金外流或其他重要目的時，概不得通融。美國財長摩根索之建議，匯率一經協定之後，僅於因糾正重大不平衡狀態必需變更時，並獲得會員國五分之四票數通過後，方可變更。此項規定似欠缺彈性，不如英國凱恩斯之計劃較為適合變動時期之需要。按凱恩斯之計劃，會員國兩年以上之平均借差即透支額超過其限額的四分之一時，該國即可自動的降低其匯率的百分之五。此一規定雖較美國建議有伸縮性，在工業國家已足應付，但在農業國家尚嫌不足，因當逆差連續兩年超過限額四分之

一時，百分之五的匯率差數在經驗上決不能產生有效的調整力量，故有增至百分之十的必要。

#### 四 國際匯率的經濟支持

國際匯率經各國運用政治力量協定以後，仍須在經濟方面予以支持。美國之建議利用平準基金，其辦法與現今穩定美元金鎊及中美平準基金的運用相類似；而英國的計劃則完全基於現今各國通行之一般單行的銀行原理。

摩根索建議每一會員國必須提供若干基金，其應認基金之數額依其黃金與外匯之持有量及國際貿易與國民所得之情況攤定之。同時即依照此攤額規定處理各國超額借差與超額貸差的辦法，於是基金管理局可以買賣黃金，各國的通貨，及政府證券，並從事借貸，進而直接支持國際匯率。加以此種制度可能用以限制支持任何特定的通貨，且可使該國家隨時儘可能改正其經濟上情況，以穩定其匯兌價格。

凱恩斯計劃雖基於一般通行單純的銀行原理，但並不需用現金付賬，只須會員國先在清算機構中開立戶頭，由債務國開具支票與債權國劃賬。債權國除非本身於匯兌上有必需時，不將此項劃賬所得存款提走，經過如此來源的累積，國際清算機構可將此項存款貸與債務國；換言之，即債務國可以在國際清算機構中透支。至於每一逆差國家透支額之多寡，乃根據其國際貿易而決定其比額，此後債務國可利用此項比額多寡要求較多之信用透支，藉以改進其本身之經濟狀況。此種制度既代替立即須用現金償付，而將債權國之剩餘借給債務國利用，當然有利於國際貿易，而足以延緩逆差國家之貨幣貶值，即為支持匯率。

凱恩斯計劃對於信用限額在最初過渡時雖係參照每一國家假定戰前三年之貿易平均總數而定，但因任何理由認為此種辦法不妥時，得一特別估額代之，嗣後則每一國家可以依其前三年實在貿易額的平均總數逐年予以修正。此種辦法對於缺乏可靠統計及環境變遷頻繁之

國家似較摩根索建議為便利，因摩根索建議確定會員國間貨幣買賣的比率應以穩定匯兌關係為基本原則，一經協定之後即成定案，非經會員國五分之四投票通過不能變更。

吾人如採用美國之建議，則有下列幾點原則上之意見：

(1) 會員國為應付國際上收支逆差向基金會購買外匯之限額，不僅依各會員國之基金分攤額之多寡而定，應再參酌各國之土地面積，人口數量，資源多寡，及戰後建設需要等因素決定之。

(2) 戰後世界經濟情況決非目前所能估計無遺，限額變更之限制如過嚴，恐缺乏伸縮適應性能，似可規定最初三年為一試驗時期，在此期間隨時可以更正，以後則根據以往三年間各種情況逐年修正。

(3) 匯率協定以後，在基金會成立之最初三年內，國際貿易處於逆勢之國家得憑其借差超額之多寡在百分之十的限度內自由升降其匯率。

(4) 基金會為穩定各會員國之幣值，及平衡各會員國之收支差額起見，得買賣各國通貨，但其政府證券須經該國政府同意後方能出售。

(5) 為防止片面的貶價行動起見，會員國不得以其高於其貨幣計算之協定價值購買黃金。

(6) 會員國得用黃金向基金會購買國際通貨以支付其在基金會往來賬上逆勢收支差額；但不得用其在基金會之往來賬上因順勢收支差額所獲得之任何餘款購回黃金，如是可集中黃金於基金會，以減少黃金在國際市場上操縱金融的功能。

(7) 國際貿易處於逆勢的國家應許其管制其本國人民之外匯，採用關稅政策及其他限制方法以恢復其國際收支平衡。

(8) 國際貿易處於順勢的國家，其貸方差額逾某種限度時，在國際間應擔負限制出口，將順差折合國際通貨保存於基金會，提高匯率，減低關稅，及舉辦國際放款等義務。

## 五 管理機構之組織

各國既感於戰後需要建立一國際通貨單位，穩定國際間匯率，建立一種更為完善之國際聯合清算制度，甚至於需要一防止國際貿易過分不平衡的方法與計劃，自應組織一國際管理機構以處理此等事務。組織此國際機構之原則應儘量民主化，避免政治性，使其成為一純粹屬於技術之機構。

此國際機構應設一董事會，由聯合國家之政府依照商定方式各派董事一人及候補董事一人組織之，但其本國政府有隨時撤回或改派之權。董事會設主席一人，由董事互選之；董事任期二年，連派得連任。董事會就董事中選總經理一人，充任此國際機構之行政業務首長。董事會又就董事中推選若干常務董事，經常駐在此國際機構所在地，執行董事會所賦予之職權。

會員國在董事會之投票權并非與他的基金分攤額或信用限額成精確比例，除每一國家保有一基本投票權外，更須依其基金分攤額或信用限額之多寡，國家領土面積的大小，人口數量與資源潛在力的厚薄等因素遞增之。任何一個國家之投票權不得超過全體之百分之二十。

董事會之一切決議須經投票權五分之三以上權數之表決始得成立，決議後會員國均有遵守并履行之義務。會員國如對董事會之決議不履行其義務時，董事會應宣告暫行停止其會員資格，在此期間，該國不得享受會員權利，但仍應擔負與其他會員國同樣之義務。

董事會應每年舉行年會一次，并作成一年間工作報告提出於年會，遇有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如有投票權總數五分之一以上的會員國家請求，董事會主席應召集臨時會議，討論該會員國之提議事項。

此國際機構之辦事處可分設在美國，歐洲，及遠東之主要經濟都市。董事會則在上述三處輪流舉行會議。

此國際機構既為聯合國家所共同組織，其會員國資格可視為聯合

國家在戰後之一種權益，且其目的為促成國際經濟之全面合作，以免戰後世界再遭遇經濟痛苦的不幸，故一經成立，會員國均不得退出。歷史上許多國際組織之破壞，每先由會員國用退出方法為不合作之起點，進而釀成嚴重的不幸。蓋國際間的一切糾紛與意見不同，苟非有意破壞和平，欲造成禍亂，決無不可開誠布公用協商的方式予以解決也。

此國際機構既以全世界之經濟合作與繁榮為目的，聯合國家不過為發起國或創始國，其他非聯合國國家當然可以參加。至於戰時敵國，俟其改建成一足以負擔會員國義務之國內組織，而願遵守此種國際經濟合作之原則時，亦應許其加入。為便利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間之貿易計，此國際機構可准許非會員國政府之中央銀行開立貸方清算賬戶，但無透支信用之權利，當然更不能有其他一切發言權。

## 六 長期信用與投資

此次大戰之破壞程度與範圍，較諸上次大戰為廣大且劇烈，因此戰爭結束後全世界各地期望於復興建設程序自有迫切需要，於是供應資金遂又成為國際財政經濟重要問題之一。

一九一八年之大戰結束後，少數資力雄厚國家曾將巨額資金用貸款或投資方式輸往各國。此種資金之移動亦曾造成貸借雙方人為的經濟繁榮，且使借入國家能保持其不穩固之債償能力；貸出國家之輸出額雖亦曾因此保持相當高的水準，但對於收入則又造成許多障礙。事實上大部份資金之移動皆屬短期貸款，隨時可以提出償付要求，不過供債務國週轉的償付，於是債務國之債額遂不斷增加，以致已經不穩的局勢再加上一不穩因素。大量國際貸款皆浪費在此種不生產部門，極少貸款則成為人為的與暫時需要的刺激物，在此刺激狀態下之世界生產與貿易雖曾增進一時，但速率不足，且又向着錯誤之方向發展，根本未注意到資金移動所引起之糾紛，其貸出程序與經濟政策完全不相關聯。當時發生如此之情況，貸出國家惟有繼續不斷的貸出才能掩

飾其商業政策及索債政策之矛盾及其固有之不健全性質，以延緩必將來臨之清算日期，借入國家則無不覺其自身為一負債額比收入額更增加得快，惟有被迫逐漸用其收入之大部份充償債之用，或繼續增加新債以保持人為的繁榮及不穩固的償債能力。此類不健全的信用與投資政策既造成貿易限制與貨幣不穩之後果，最後到借貸之來源涸竭，同時債額要求更形迫切之時，債務國祇有破產之路，且牽引不健全之債權國同墜深坑，此乃此次戰前世界經濟不景氣主要原因之一。

吾人既鑒於此次戰後國際資金之流動完全缺乏建設性，而此次戰後聯合國政府傾向於所謂社會目標之意識已較前為濃厚，將來不能不履行其建立世界繁榮及提高人類幸福的諾言，因此對於世界復興建設的國際長期信用與投資應有一週密完善之設計與機構。

美國財政部所擬之聯合國建設銀行計劃正適應此種需求。今姑將組織此國際銀行之技術方面細目於下，而在原則上主張應為一非政治性，完全為協助各國在戰後建設工業發展生產資源之國際銀行。

此國際銀行之信用與投資不應含有排斥私人投資的政治意味，正所以補充戰後私人投資之不足。在戰事一經結束之後，必有若干國家需要資金異常迫切，均可在合理條件下從私人投資機關獲得供應。但全世界許多區域的迫切需要，其數量決非任何一富有國家或一私人資本機關所能負擔，國際銀行自可在同樣條件之充分保證銀行資金安全之條件下補充其投資額。至於對於聯合國國家有計劃之建設及經其政府保證之一切工業生產，國際銀行則負有長期信用與投資之義務。此種長期信用投資之目的，不獨促成國際長期資本運用於工業生產資源之正常發展，以扶助提高會員國之生產力，且即所以間接促進會員國間國際貿易長期平衡的發展。

此國際銀行與一般銀行然，需要設置一經濟研究部門，經常研究整個世界與各會員國之經濟情況，并審慎研究每一投資對象之真實需要及其成效與進展，然後提出書面報告。銀行對於每一被投資事業之是否能直接或間接提高借貸國之生產率，是否能影響該國的預算及收



支之平衡，雖與一般銀行業務然，應予以經常注意與考慮，但對於審核投資對象的限制不宜過嚴，凡合於增進世界繁榮提高人類生活的條件者都應予以善意的援助。

此國際銀行與穩定世界通貨之國際機構應有經常聯繫。如關於貨幣單位、匯率計算、借貸賬目等都應採取同一步驟。此銀行在股東國家政府同意之下，得從事抵押貼現買賣外匯借貸信託等一般銀行業務，但其營業對象祇限於(1)股東國政府及其中央銀行與財政管理機關，(2)穩定世界通貨之國際機構及其他財政經濟之國際組織。

國際銀行之本身及其行員應審慎避免干預任何股東國家或被投資國家之政治。凡行員之欲在其本國從事政治活動者，應先解除其在此銀行中之職務。銀行對於申請貸款之審核不應受任何政治性質之影響，祇可憑其在經濟方面之考慮，然後予以定奪。

至於此國際銀行應如何組織，應根據一般股份有限公司之原理。銀行之股份由聯合國政府分認，其分攤額數則以各國之歲入及其國際貿易額等有關事實為根據。國際銀行之股份不得轉讓估價或課稅。銀行之管理機構及其股權之規定將一如組織管理國際通貨機構之主張，保持純粹之經濟性與民主化。

## 七 結論

現今全世界經濟思想中之各國學者所發表之一般意見漸趨一致，此種意見實係時代精神之產物；吾人將一般基本意見容納於戰後實際工作之機構中，可以引起吾人必須應付之未來經濟困難逼使解決之。集全世界人類之精力，無疑的無有不可達到之目標，因世界具備着基本資源，而此等資源均有加以適當利用的可能。但此次大戰後之形勢在性質上同一九一四年戰後之形勢無甚差別，祇有更感困難及複雜。如果戰後國際貿易仍擁滿矛盾與衝突，則一切從事上述各種實際工作之國際機構，其存在將不易久遠；如果若干國家之國際收支平衡仍如

戰前之同樣逆轉，則各種國際性計劃之實施亦不能久遠。

國際貿易乃勞役以外各國交換實質貨物之程序，為自然富源未開發或財力不足之國家向富有國家換取資金與償還債務之方法。全世界之天然資源技術及財力分散在各地，每一國家均擁有別國所無之資源，每一國家不論其幅員如何廣大，仍不能充分擁有構成健全經濟基礎之一切因素，每一國家如果僅靠其本國之資源必不能以近代生活之必需品供給其人民，每一國家決不能在孤立中使其人民之生活水準能到達全世界實現經濟互助時之生活水準。各國如傾向於一國或某一集團之狹隘的自足自給主義，或基於其他理由採取阻礙國際貿易或減削其效力時，必被迫減縮或停止發展其有效率生產而盡量發展其無效力生產。實則此種行動不僅自己剝奪其本身所應享受之國際交換利益，且使其他國家不得不同樣辦理，結果必至全世界之生產減退停滯，全人類之生活大部分不能不被迫而大為降落。國際貿易如因盡可能的遵循全人類之自然利益與相互利益之原則推動，定能奠定全世界經濟和平之基礎與促進人類福利不可或缺之因素；反之，遭受過甚之壁壘所阻礙或被迫走入人為途徑之國際貿易，則成為經濟戰爭之有效工具，殘酷的成為人類福利之抑壓機。

戰後之世界雖廢除了國家，大部份之經濟活動仍不免為國家性者，如無適當之國家政策與措施顯然不能得經濟上之進步，但如處於經濟戰爭之狀態下亦同樣得不到進步。所以戰後主要關鍵在於每一國家之內經濟政策須與國際經濟政策能相互聯繫，不相矛盾，甚至於每一國家於戰後必須準備接受某種程度之超國家措置。要而言之，本文所論之國際貨幣與金融之合作計劃，較之戰後各國所被要求接受之政治合作辦法與軍備減縮計劃尚為溫和。戰後國際貨幣與金融之合作，對於未來世界的經濟繁榮與和平爭取實肇其端，故希望聯合國能首先放棄其戰前自由使用之無紀律，無秩序，不合作，損人害己而不利於全體人類之自私與放縱政策也！

# 懷特戰後貨幣計劃與國際銀行計劃

會紀桐

一

赫利懷特氏 (Dr. Harry D. White) 爲現時美國經濟學權威，以去年四月美財部提供戰後國際通貨計劃，懷氏爲此計劃主稿人，聲譽著稱一時。懷氏幼年攻讀於哈佛大學，追隨陶錫格教授 (Prof. F. W. Taussig) 專研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一九二九年以哈佛大學獎金，赴法研究法國戰前財政，國際貿易，及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回美後著有法國國際收支平衡問題 (Balance of French International Account 1880-1913) (一九三二年) 一書，爲哈佛經濟叢書中的重要著作。一九二八年曾助陶教授重訂陶氏的名著美國關稅問題 (Some Aspects of the Tariff Question)，懷氏短篇著論很多，散見於美國各經濟期刊，此次大戰發生以來，任美國財政部錢幣顧問，對於美國戰時財政，擊劃極多。

去年春英美兩國同時提出戰後國際通貨計劃，筆者對英方所提的凱因斯計劃，曾爲文論及 (載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二十期)。凱氏爲劍橋經濟學派權威，與懷氏所屬之哈佛經濟學派，可謂同出一源，皆追宗於利卡圖 (Ricardo) 與密爾 (J. S. Mill) 等的經典學派。故凱氏所擬的英方計劃與懷氏所擬的美方計劃，相同之處至多，其不同處，或係原於英美兩國國情與經濟背景的不同。英美兩貨幣計劃的提出，皆針對着戰前國際貨幣的惡性競爭，擬於戰後國際經濟合作的場合下，求幣制的改進和建設。本篇僅就懷氏貨幣計劃與國際銀行計劃，加以論列，尤側重在檢討兩計劃的配合性。

二

自第一次大戰後，迄於這次大戰，在這二十餘年中，各國間發生了無數惡性經濟競爭，如關稅壁壘，匯兌統制，貨幣貶值，貨物傾銷，經濟集團的形成等，結果對於國際經濟都有極嚴重極深遠的影響。自一九二九年後世界經濟蕭條，各國所受的影響，尤爲慘重。第一次大戰後，美國首先恢復金本位，繼之英國於一九二五年恢復戰前英鎊本位，法國於一九二八年恢復法郎本位將幣值貶低。各國恢復金本位後數年的實際經濟情形，皆與當初所預期的趨向適得相反的結果。英國到後來乃感恢復金本位時，英鎊價值規定太高。法國則感覺新法郎的幣值規定太低。美國則以當時過量黃金情形下所施行的低利政策，非但未能促使黃金外流，反促成證券市場的暴漲，外資流入，及黃金流入。金本位的運用不靈，因此均被迫而放棄。自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後，不久美國日本法國及其他各國亦相繼放棄，金本位制乃根本發生動搖。關於這方面的演變，瑞典經濟學者卡塞爾教授 (Prof. G. Cassel) 所著金本位的崩潰 (Downfall of the Gold Standard) 一書，述之最詳。

在金本位制仍在運用的時候，各國匯價的波動，不能超過現金運送點，但自各國放棄金本位後，其幣值與黃金脫離關係，匯價的變動，乃毫無所憑。英法美三國乃發起訂立一種貨幣協定，以維持國際匯兌與貿易上的均衡，防止貶低匯價等競爭的辦法，並利用平準基金去求匯價的穩定。三國雖已不是金本位，但仍以黃金爲其貨幣的聯繫。該協定後來還有比利時荷蘭等數小國加入，而且到現在還未取

消，但機構是暫時的，氣魄不大。不過即此已足表示國際匯價問題的急須設法穩定。此次美財部所提懷特通貨計劃，大致可說是由上述三國貨幣協定脫胎而來。

## 二

懷特國際通貨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建議於戰後成立一國際平準基金 (International Stabilization Fund)，以黃金為基礎，穩定國際通貨幣值，並訂定一國際清算單位，其計劃包括六要點：(一)平準基金的目的：擬議中的平準基金，其目的在穩定各參與國通貨的對外匯兌率，減少由國際收支所引起的失衡。平準基金管理當局，將規定其買賣各參與國通貨的價格，祇有經管理當局的許可，並為應付極端情勢，各參與國才能變動匯率。匯率變動既須先經國際間的諮商，則參與國間競爭性的通貨貶值，自然可以避免。又在這個計劃各項規定之下，各國已經無單獨統制外匯之必要，任何參與國均不得採取統制匯兌的新措施。但目的在制止不應有的資本流動的統制，得經平準基金當局同意後採行。至於各種複式通貨辦法和雙方匯兌清算辦法，除經平準基金當局許可者外，均將加以禁止。平準基金當局將使戰時各種封存的資金，在一定條件之下解封。(二)基金的機構和運用：使通貨穩定能實現，平準基金須能在充分保障下，應付參與國由平時交易而發生的對外匯的合法需要。要達到這目的，參與國至少應共同分擔基金五十萬萬美元，開始時以黃金，各國貨幣，及政府債券交納一半。每國分擔的定額，按照彼等所持有的黃金與外匯，國民收入，和國際支付差額的變動等因素而定。這個基金分擔定額，也都是平準基金購買各國貨幣的定額，在通常情形之下，平準基金購買各國貨幣（即對各國通融）不得超過各該國定額百分之二百。(三)基金管理當局的權限：基金當局有權買賣和持有黃金匯票，有權買賣各參與國的貨幣，並經參與國的同意後，買賣彼等證券。基金管理當局經有關國家的允許，亦得向彼等借用彼等之通貨。此外經有關國家的請求，亦得將基

金所持有該國貨幣的一部份貸與該國。(四)新國際單位的產生：這計劃建議創立一國際黃金貨幣單位，命名為「佑尼達」(Unitas，含純金一三九又三分之一英厘，等於美金十元。這種國際單位是平準基金帳目的計算單位，但並不鑄造這種單位的金幣，也不發行這種單位的鈔票。各參與國得將黃金存於平準基金以換取這種單位的信用，同時這種信用亦可以兌取黃金，並可在參與國間轉移。(五)基金的管理：基金由一代表各參與國的董事會管理之。每國的投票權依其對基金資本的負擔額而定，但任何一國的投票額不得超過總票百分之二十五。董事會的普通決定經多數通過發生效力，但特殊決定，如各參與國匯率更動的許可等，須經五分之四之通過，始能生效。(六)參與國的責任：各參與國應維持匯率的穩定，取消匯兌統制，善意考慮平準基金當局對貨幣有關問題的建議，及對防止資金外逃等問題與其他參與國採合作的態度。

## 四

從以上內容觀察，懷特貨幣計劃可視為一種修正國際金本位制。大體言，該計劃與過去金本位制不同之點，即過去貨幣的主權操諸各國，現在設立平準基金一種國際機構，將各國大半貨幣主權移轉到此國際機構。再過去各國有各國貨幣單位，現在成立一國際單位「佑尼達」，以與各國貨幣聯繫。又以往對於國際間短期資金的流動無法控制，現在成立這國際機構，將國際間短期資金的流動加以管制，這是機構上幾個大不同點。

根據國際貿易國際匯兌原因，以往國際金本位調節國際金融，維持國際經濟均衡的方法，簡單的分析，可分為下列各步驟：(一)一國貨幣匯率定為一定合金量（如英鎊定為純金一三三·〇〇一六英厘 Grains，美幣一元定為純金二四·七五英厘）；(二)匯率如遇變動——上升或下降時，影響於黃金流動——流入或流出；(三)黃金的流動影響於中央銀行黃金準備額的變動，即黃金外流時促使銀行準備的減

少，黃金輸入時促使銀行準備的增加；(四)銀行準備的變動(增加或減少)影響於貿易各國資金信用的變寬或變緊，物價的上漲或下降，人民收入的增加或減少。以上種種變動的次第發生，足以調節當初引起國際收支上的變動(即出超或入超)——亦即促成黃金在國際間流動(流入或流出)的因素，此種演變的程序，足使貿易的國家再達於均衡情形。以上種種國家貿易和國際金融變動的程序，幾為百數十年來英美經濟學者所共信為國際經濟上不易的步驟，亦以往國際金本位所視為不易的自動調節的法則。

但戰前金本位宣告崩潰，充分證明了這種貨幣制度運用不靈。過去國際金本位之所以失敗，約有兩大原因：一、為世界各國黃金分配的不合理化，多者過多，少者過少，不能適應各國的需要；二、為世界黃金生產量不足，且產量年有不同，致引起各國幣制上的波動。這就懷氏對於過去弊病，曾下極大工夫，加以矯正和補救。但懷氏計劃對於各國貨幣互相聯繫仍以黃金為基礎，且利用黃金的彩色異常濃厚。此種貨幣計劃，如加以分析，仍不出為一種變像的國際金本位。此種計劃施行起來，在國際貿易和國際匯兌變動和調節方面，與金本位的運用，亦處處相似。此計劃的調節步驟可簡單分列如後：(一)各國的通貨單位不定為含金若干，而改定為對成立中的國際通貨單位(依尼達)的比率若干；(二)以前需黃金運出或運入，以平衡國際收支，現在無需運送黃金，而以平準基金內的劃帳辦法，支付國際差額，補代黃金的流動；(三)平準基金內的付方或收方的劃帳促使各國中央銀行準備的增減及貨幣信用的寬緊，一如黃金流入或流出所發生的影響；(四)各國中央銀行準備的增加或減少對於各國國內金融及物價所可發生的變動，亦將一如國際金本位制的運用。不過這方面平準基金管制的機會較多，通融補救的辦法亦多，因此各種波動亦將隨而減少。準此以觀，懷氏戰後國際貨幣計劃，仍不出為一種修正國際金本位制。

## 五

懷特計劃的特殊處，可得而言之者，約有下列各點：(一)黃金的彩色異常濃厚，這層可由下列各點見之：(1)平準基金的籌集以黃金為基礎；(2)建設中的國際單位「依尼達」定為含純金量一三九又三分之一英厘，等於美金十元；(3)參與國得將黃金存入基金以換取依尼達單位的信用，這種信用亦可以兌取黃金，凡此都是特別有利於持有黃金的國家。(二)對於債權國比較有利，照國際經濟上觀察，持有黃金國亦往往為債權國，這點已經是對債權國有利，且基金開始時，參與國須繳入現金，此非戰後債權國，恐不易辦到。又將來國際收支上的「順差國」(即出超國)，照國際經濟均衡的觀點看，與「逆差國」(即入超國)同為一種失衡狀態，但順差國則無需經過調整處置，說來還是一面倒的辦法，也是這計劃的一缺點。(三)對於各國貨幣的處理基金當局的權過大，而與各國諮商的機會過少。(四)各國投票權依據其對基金資本的負擔額，而不以國家為單位，將來操縱之權必落於黃金，外匯，國民收入，和國際支付差額總額最高的國家，是無可疑義的。

從以上各點觀之，可見懷氏貨幣方案充分將戰後美國在經濟上的強點提高於有利地位，照此計劃付諸實施，戰後國際貨幣金融牛耳，其必屬於美國，是預料中事。若與英方所提的凱因斯計劃相較，尤易見出此種論斷之不謬。不過整個戰後國際經濟合作，除幣制外，尚有國際貿易，國際投資，與各國生產分配適當處置三大部門。就中尤以國際長期投資機構的不可缺少，為最顯而易見。此時最明顯易見的，各國在戰後，除美國以外，都面對着戰爭大破壞後龐大的復興建設問題。在大破壞後需要大建設，無論歐洲各國，在遠東方面，抑在南洋方面，將來皆須仰給於經濟充實國家的借款投資，以舉辦其戰後復興建設事業，美國不待言，是戰後最重要的資本供給國。至從國際經濟均衡上看，懷氏貨幣計劃的最大缺點，亦為缺少國際長期投資機

構，無以處置戰後復興建設期中各國長時期間繼續入超的失衡狀態。國內經濟學者亦當論及此點。因此有去年十月美財政所公布的懷特聯合國銀行(United Nations Bank)計劃(以下簡稱國際銀行)。

## 六

懷氏通貨計劃公布後，各方的一項重大批評，即為該計劃缺少國際投資的部份，這項缺點，至去年十月懷氏國際銀行計劃的公布，可謂得到了一個圓滿的答案。由是可知懷氏通貨計劃與其國際銀行計劃的配合性。懷氏國際銀行計劃的主要內容：(一)目的：擬議中的銀行在供應資金以進行遭受戰禍各國的長期建設，其基金將補助私人資金之不足，並將假手各政府轉貸。該銀行將鼓勵私人金融機關供應長期資金，以發展其會員國(指參與該銀行的各國)的生產資源。必要時並將與私人資金合作，及補助私人基金的不足，以達到此目的。(二)資本：該銀行的資本約達一百萬萬美元，由會員國分籌，大部份資本將保留為該行所保證或該行所發行證券的保證金。會員國第一次及其後交納之資本，應有一部為黃金，一部為該國的通貨。黃金的比率不超過交納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各國交納黃金的比率，將就每一會員國的存金額加以規定。該行所有之各國通貨，將由會員國以黃金重予收回，其比率佔其每年應交納數額百分之二。(三)業務：凡以私人資本貸與任何會員國政府的貸款，及假手該會員國政府轉借其國內政治部門與貿易及實業機關的貸款，均可由該行加以保證。該行並得參加私人資本貸出的貸款，唯有借貸者不能以合理之條件自私人方面獲得借款，該行始可自其本身基金中撥款貸與之。(四)投資貸款的規定：該行所為的一切決定，將純基於經濟上之立場。該行接受任何保證貸款參加貸款或舉辦貸款的申請書時，應考慮下列三點：(一)投資計劃的是否健全，(二)保證貸款之會員國的預算情形，(三)該會員國之未來之收支平衡。國際銀行所參加之一切貸款，或銀行擔保或該行本身所舉辦的貸款，必須具備下列各條件：(一)本息的清償應由會員國之

政府加以充分保證，(二)投資計劃必須由有資格之委員會加以調查，並經其批准，(三)貸款的條件必須合理，(四)該銀行對其所保證之貸款應負損失賠償的責任。國際銀行對於貸款所得的應用方式不得提出任何條件。以任何一國的通貨為貸款者，非經該國的同意，不得舉辦。國際銀行唯有與會員國政府，會員國中央銀行，及以會員國為主之國際機構進行交易，或假手會員國政府與上述各機構進行交易，該行須經會員國贊同後，始得保證。各會員國所為之國際貸款，該行經會員國之贊同並與國際穩定基金機構諮商後，亦得出售其所有基金或外匯。該行的資金產業將為會員國的利益而加以運用。(五)該行的管理：該行的管理權操於董事部，董事部有董事長一人，尚有輪流由各會員國指派的董事長一人，董事部將指定執行委員會，顧問委員，及其他有設立必要之委員會。會員國投資票權之大小視其股金而定，任何一會員國得於一年前提出退出通知。上述暫時計劃與美財部目前提出的國際通貨平準基金計劃或將受同樣的待遇。

## 七

從以上內容，可知擬議中的世界銀行在補充國際通貨穩定計劃關於缺少國際投資部門的大缺點，國際銀行與國際平準基金機構，實輔車相依，交互為用之國際貨幣金融機構。由是可知懷氏貨幣計劃與其銀行計劃的配合性。簡言之，戰後國際貨幣的價值，一方面可靠國際平準基金計劃的實施，以維持穩定，一方面對於國際收支長時間失衡時，可賴國際銀行的國際投資政策的輔佐，以維持各國經濟均衡。穩定通貨計劃的重要，固無待言，擬議中的國際銀行這項國際投資機構的重要性，亦因此而充分顯出。貿易逆差國之需要長期投資以維持均衡的理由比較易見，但貿易順差國之需要繼續向國外投資，以維持均衡，以英國數十年來的對外貿易及國外投資的實際情形言，亦是必要的。故世界銀行的設立，是逆差國與順差國兩得其益的計劃。

懷氏銀行計劃最令人批評的地方，一如其貨幣計劃，即將黃金地

位過度抬高，黃金的彩色太過於濃厚。但此項銀行計劃如付諸實行，對於戰後國際經濟造福之處極多。預期中收穫可得而言者，可有下列數事：(一)戰後需要進行大規模復興建設的同盟國，以此銀行的設立，可有供應各項建設所需巨額資金的籌措地處；(二)戰前國際幣制因黃金分配不均而發生的種種惡性影響，可因此銀行的運用，將黃金較合理化的分配，國際幣制可望臻於穩定狀態；(三)因國際銀行國際投資政策的運用，各國對於所需主要原料的分配問題，及原料品價格波動問題，可望解決其大半；(四)此項銀行計劃的實施，可使各國免除自金融方面措施不當所產生的經濟恐慌；(五)戰後各國的生產及各國人民生活水準可因而提高。

## 八

從以上各節的檢討，可知懷氏兩項計劃所示解決戰後國際經濟問題的對象。戰後國際經濟合作，原可包括四大部門：(一)國際通貨，(二)國際貿易，(三)國際投資，及(四)各國生產與分配的適當處置問題。現在美國對於國際通貨及國際投資兩大部門，已提出具體方案，可謂已着手解決國際經濟合作問題的大半，所餘者僅戰後國際貿易問

# 美國之高度工業化

美國工業經濟的發展，與幾次戰爭有密切關係。由於獨立戰爭(一七七五——一八三年)，美國得以解除英國的殖民化桎梏，本國工業，始有抬頭機會。由於南北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南方農業所加於北方工業的阻礙又得以掃除，美國工業才突飛猛晉。一八八〇年後重工業尤見發展，至一八九〇年頃，美國鐵鋼產量已占世界首位，至一九〇〇年頃，煤產量也已趕上英國而居世界第一。此則由於

題，及此問題相聯帶的各國生產與分配的適當處置問題。將來關於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或類似機構方案的提出，為預料中事。

我國為聯合國中主要國之一，戰後國際合作將佔重要地位，亦為預料中事，是以將來至有參加這種國際通貨及國際投資機構的趨向。但最後的決定當以本國戰後經濟政策為準繩，這點現在已略可窺見途徑。我國於此次戰事結束後，各項破壞亟切需要建設，毫無疑義。再我國戰後經濟政策主要在實現「國父實業計劃」及「總裁「中國之命運」中所昭示的經濟建設計劃，換言之，即於戰後最短期間，實行工業化政策。最近政府對於利用外資協助經濟建設，亦經表示贊成。我國一向為入超國，戰後龐大工業建設計劃的付諸實行，必有大量機器及工業物資進口，且在在需要工業資金的籌措，故在戰後若干年中，貿易逆差及「入超」趨勢，必然更甚，長時間的失衡，可能性至大，其有賴於世界銀行國際長期投資政策的運用以資調劑，以維持均衡，不啻而喻。本文的檢討，除指陳懷特通貨計劃與其銀行計劃的配合外，同時亦可顯示以上兩計劃與我國戰後經濟建設的配合。

湯德明

美西戰爭(一八九八年)以及其他軍事行動，美國得在海外開闢廣大的市場。由於首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八年)，美國工業充分成長，并由債務國一變而為債權國，國內集中甚多黃金，其經濟地位且一躍而居英國之上，至一九二九年，遂呈現空前的繁榮。溯自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二九年之七十年間，美國工業生產增加二十一倍，而同期間，英國不過增加二·九倍，法國五·四倍，德國也祇八·一倍。

美國工業生產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尚次於英、法、德而居世界第四位，在七十年代，亦仍次於英、法而居世界第三位，在八十年代，則僅次於英國而居世界第二位，在九十年代，則躍居世界首位。由第四位到第一位，前後歷時不過三十餘年光景吧了。由於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美國生產力量再進一步，得達於戰時高度繁榮。茲舉煤、鐵、鋼歷年生產量為表一，以見美國工業之成長情形。

表一 美國工業之成長

年 別	煤 位	百 萬	公 噸
一八八〇	六四·九	三·八	一·二
一九〇〇	二四四·六	一三·八	一〇·二
一九一三	五一七·〇	三一·〇	三一·三
一九二九	五五二·三	四三·三	五七·二
一九四一	五二〇·〇	五五·九	八三·〇

(註) 一八八〇——一九一三年數字，據「法國統計年鑑」Annuaire Statistique, Stat. Générale de la France, 1881—1913年號「國聯統計年鑑」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33-39。一九四一年，煤係估計數，鐵、鋼數字據俄文「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月號。

在一八五〇年，美國煤產量僅六百餘萬公噸，至一八七〇年增至三千萬公噸，一八八〇年已達六千五百萬公噸，一九一八年增達六億一千五百七十萬公噸。其後多年迄未達到此額，一九二九年亦不過五億五千餘萬公噸。即以一九二九年與一八五〇年相比，也約增九十倍以上。一九四〇年擴軍後，煤產又行激增，并有駕凌一九二九年的趨勢，此在煤的比重逐漸降低之今日，尤有重要的意義。(煤在美國燃料中比重逐漸低落，如在一九〇——〇五年比重為八八·七%，一九三〇年即不及六十%，一九三七年更減至五〇·四%，因為煤已可

為石油、水電、天然瓦斯所替代，而節省燃料的進步，也使煤的需要減少。)

次就鐵生產而言，在一八五〇年，僅約五十六萬公噸，至一八七〇年，增至一百六十六萬公噸，一八八〇年，已達三百八十萬公噸，一九二九年又增至四千三百三十萬公噸，一九四〇年為四千七百萬公噸，一九四一年更增達五千五百九十萬公噸，前後增加一百倍之多。

再次說到鋼的生產，在一八五〇年尚無紀錄可考，在一八七〇年約為六萬九千公噸，至一八八〇年，增至一百二十萬公噸，一九二九年增達五千七百三十萬公噸，一九四〇年更增至六千七百萬公噸，一九四一年為八千三百萬公噸，一九四二年為八千六百萬噸，一九四三年估計可達八千七百萬至九千一百萬噸(同年，政府之鋼生產額的則為九千一百五十萬噸)，與一八七〇年相較，則已增一千二百六十倍以上。

除煤、鐵、鋼外，電力在現代工業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美國之公用電力，在一九一二年為一七·六「十億」瓦時，一九二九年為九七·三「十億」，一九三七年為一二一·八「十億」，一九三九年為一三〇·三「十億」，一九四〇年為一四四·六「十億」，一九四一年為一六二「十億」。前後三十年間，增加九倍有奇。

美國在一九二九——三三年，因遭經濟恐慌影響，工業生產祇有跌落，甚少增長。一九三七年雖回復舊觀(據表二統計，一九三七年工業生產指數略超出一九二九年，另據彼特羅夫著一九四二年莫斯科版「美洲合眾國」一書統計，則一九三七年僅及一九二九年的九二·二%)，但翌年又行低減。惟自一九四〇年起，因積極擴軍關係，工業生產指數經常超過一九二九年，并超過很多，這實在是有決定意義的事實。

表二 近年美國工業生產指數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八年
一九八〇年	一九八一年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八年
一九九〇年	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三年
一九九五年	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〇〇〇年	二〇〇一年	二〇〇二年

(註)據聯邦準備局(Federal Reserve Board, 簡稱 F. R. B.)統計彙編而成。

依據聯邦準備局統計，美國工業生產指數，在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一九四〇年增至一二三，一九四一年一月續增至一四一，一九四二年一月達一七二，一九四三年一月已至二〇〇，估計一九四三年秋約為二二〇，則恰為一九二九年之二倍，即為一八六〇年之四十二倍。

至言工業生產總值，在一八五九年為一・九「十億」美元，一八七九年為五・四「十億」，一八九九年為一一・四「十億」，一九一九年為六一・七「十億」，一九二九年為六九・九「十億」，一九三九年減為五六・八「十億」，其後諸年工業生產總值雖不得而詳，但已知全部生產總值(包括非工業生產總值在內)，在一九二九年為九九・四「十億」，一九三九年為八八・一「十億」，一九四〇年為九七・一「十億」，一九四一年為一一九・五「十億」，一九四二年為一五〇・七「十億」，一九四三年估計可達一八八・〇「十億」美元。以之與一九二九年比較，約已增加一倍，與一九三九年比較，已增加一倍有奇。由此推論，則工業生產總值亦應隨之倍增。

就工業生產總值言，在一九二九年，曾占世界工業生產總值的四七%，較整個西歐所占成份(四四%)為尤多。在一九三八年，亦較德、英兩國合計之數尚超過十一%，一九三九年後，其世界地位當較更高。

就工業生產數量言，以一九三八年為例，則如表三所示。惟該年為美國經濟較蕭條之一一年，工業生產亦較低落，此不可不注意者。

表三 美國工業生產之世界地位(一九三八年)

世界產額	美國產額	占%
電力(十億基羅瓦時)	四二四・〇	一一五・九
鐵(百萬公噸)	八一・七	一九・五
鋼(百萬公噸)	一〇八・九	二九・二
木漿(百萬公噸)	一九・三	四・八
紙(百萬公噸)	二〇・七	五・八
水泥(百萬公噸)	八二・五	一八・三
人造絲(百萬磅)	一、〇三五・〇	二六〇・〇
硫磺(百萬磅)	九五八・〇	三〇・〇
汽車(千輛)	四、〇二一・〇	二、五〇〇・〇
船舶(千噸噸)	三、〇三四・〇	二〇一・〇

(註)據日本「金鋼鐵」一九三七年數字。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又有表中紙之產額係一九三七年數字。



在一九三八年，美國工業生產尚多有不能占世界首位者，船舶即為一例。但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船舶生產增加一百倍，即由二十萬噸增至二千萬噸後，無疑已是世界第一。

再從工業部門加以研究，美國的重工業尤其是機械工業，特別發達。機械工業生產價值，在一九一三年，占全世界五十%，在一九二五年，占全世界五七·六%，其機械種類別，且以原動機類為最多。美國近年對外輸出商品中，就價值言，機械又占第一位。

至於美國的「新」工業（指油、鋁、酸、人造絲，汽車各業，對「舊」工業之煤、鐵、鋼、船、棉各業而言），均已居世界首位。其中製鋁業，在一九三八年之生產額尚不及德國，其後即大加擴展，一九三九年產額十四萬八千四百公噸，一九四〇年估計已達十八萬七千公噸，一九四一年六月後，政府陸續建造新廠八家，至一九四三年，美國鋁產能力已可增至九十五萬餘公噸，此數較一九三八年世界鋁生產總額尚多六十%有奇，當然已是世界第一。

再言新工業中之汽車工業，一向是世界最龐大的，其年產額常占全世界六十%以上，在一九〇〇年，尚僅生產四千輛汽車，一九二九年增達五三九千輛，據估計，同年汽車業實際生產力當在八百五十萬輛以上。在一九三九年，生產汽車三百七十萬輛，其操業率僅達四五——五〇%，在一九四〇年操業率約為五五%，即產出汽車約四百四十七萬輛。在一九三九年汽車業雇用人數達四十七萬九千，與全體黑色冶金業雇用人數相等，較全體機械工業雇用人數尤多四〇%。其所消費原料在全部原料消費中所占成份，以一九四〇年為例，鋼為一六%，鍊鐵五一%，灰鐵一四%，樹膠八〇%，板玻璃七五%，皮革六八%，鋁一〇%，銅一四%，錫一一%，鉛三四%，鋅一二%，椰一〇%，甘油一二%，何況汽車還是汽油的大量消費者（約八十%）。因此，汽車業的盛衰，常可左右美國經濟的榮枯，在戰時，則左右軍需工業生產力的大小了。

美國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還可以從下面幾個角度來測量。

就國民經濟的結構言，在一九二九年，工業生產淨值為三百零七億美元，農業則為一百二十八億。在一九三七年，工業為二百五十二億，農業則為一百億。由此可知工業生產遠較農業為多而重要。

就對外貿易中商品的性質言，在一八五——一六〇年，製成品與半製品僅占輸出總值的一六·三%，在一九〇——一〇五年，占三五·四%，在一九一三年占四八·八%，在一九二六——三〇年占五九·五%，在一九三八年增至六六·五%。美國多年以來，既為出超國家，故輸出商品之性質可以說明該國工業的發展情形。

就城鄉人口的分配言，美國人口有向都市集中的趨勢，在一八五〇年，城市人口佔全國一二·五%，一八六〇年占一六·一%，一八七〇年占二〇·九%，一八八〇年占二九·五%，一八九〇年占三六·一%，一九〇〇年占四〇·五%，一九一〇年占四五·八%，一九二〇年占五一·四%，一九三〇年占五六·二%，一九三五年增至五六·九%。一九四〇年美國五大都市（紐約、芝加哥、費城、底特律、洛杉磯）的人口即佔全國十二%。因為美國連農業也機械化了，靠土地營生的人大大減少，農村過剩勞力湧向都市，轉而依靠工商各業為活，這是工業發達國家的一般的現象。

就工場勞動的分配說，工廠商等占其大半，農業僅佔一七%。就技術水準、勞工效率說，也可見美國工業的高度發展。容當為專文論述之。

就企業組織的規模說，美國是資本集中，生產集中最顯著的國家。由於美國的煤、鐵產區之遙隔，鐵鋼價格之搖擺，戰爭與恐慌之威脅等等，早在十九世紀末葉，已有獨佔情勢，如一八七九年之「美孚煤油托辣斯」（Standard Oil Trust），可為代表。其後雖有所謂「反托辣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 及其補充法案；The 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 及其補充法案等）的成立，但事實上仍未能阻止獨佔的加強。美國大企業之年產額在一百萬美元以上者，其工場數目，在一九〇四年，僅佔全國工場數的〇·九%，

其雇工人數，則占全體工人的二五·六%，其生產價值，占達全工業總值的三八·〇%。至一九二九年，相應的數字為：工場數目佔五·六%，雇工人數佔五八·〇%，生產總值佔六九·三%，若專就「企業組合」(Corporations)而言，其工場數目，在一九〇四年，占全國工場數的二三·六%，而其雇工人數則佔全體工人的七〇·六%，其生產價值佔達工業生產總值的七三·七%，至一九二九年，相應的數字為：工場數目佔四八·三%，雇工人數佔八九·九%，生產總值佔九二·二%，在一九二九——三三年恐慌期中，生產集中，更益顯著。

至於資本集中情形，在一九三六年，納所得稅之企業組合，為數計有四一五·七千個，資產總額共為三〇三、一八〇百萬美元。其中僅約二%的組合，佔資產總額的五二·三%，在這些以及其他許多企業中，都是由少數「富翁」供資，其最著者為摩爾根(Morgans)，洛克斐勒(Rockefeller)，賈朗(Mellens)三家。在一九三二年，前二者合佔全國「企業組合」總資產達九百三十億美元，幾為總額的三分之一，而後者也有四十五億。

再就個別企業部門加以分析，如採鑛業，無煙煤鑛的八〇%為八個企業組合所有，與摩爾根，洛克斐勒所經營之鐵路公司發生密切關係。煙煤的三五%，操在三十家公司手中，其中四家大公司便佔有全國煤富源的二〇%。鐵鑛的五〇%，屬於摩爾根所供資之「美國鋼業公司」(U. S. Steel Corp.)。銅鑛的八三%為六家公司所控制，其中四家則占有四五%。

如鐵鋼業，在一九三三年，十一家公司鋼產能力佔全美的八〇·三%，五家公司則擁有七〇%，在一九三五年，十家公司擁有八二%，而「美國鋼業公司」一家，即擁有三九·二%。

如石油業，在一九三二年，美國在全世界石油投資中佔六七%，在一九三八年底，美國二十家石油公司即佔全國石油業投資總額的六六·七%，即三分之一。「美孚煤油公司」(Standard Oil Co.)，

其最著者，該公司資產總額在一九三九年底，約達二十億美元之多。

如機械業，其中電汽機械，工業用機械，農業機械，他種事務機械，幾均由少數大公司所包辦。其尤大者，如 General Electric Co., Westinghouse Electric & Manufacturing Co. 等。

如汽車業，尤為企業集中之典型。美國在一九一二年有汽車公司五十七個，當時生產由「福特」(Ford Motor)，「通用」(General Motors) 等七家占一半以上。在一九三〇年，福特佔全國四〇%，通用佔三四%，二者合佔七四%。同年汽車販賣額，二者合佔全國三分之二，若加入 Chrysler Motors 合計，三者佔六分之五。在一九三二年，通用擁有資產十三億美元以上，佔汽車生產額的五〇%有奇，福特擁有資產七億二千二百萬，佔產額三五——四〇%。

如化學工業，就炸藥言，杜龐(Du Pont)與摩爾根佔六五——八〇%。就蘇打言，一家公司即佔六〇%。至於化學肥料，則七家公司佔三分之二(六五%)，其中二家即佔三分之一。他如化學藥品，染料之販賣，化粧鉛粉等均集中於少數公司手中。

資產集中，生產集中，是現代工業經濟的特色，也就是工業高度發展的產物與條件。

最後，要附帶敘及的，是美國的生產雖然已經很有可觀，但生產設備仍然過剩，故即使在繁榮的一九二九年，煙煤生產力的負荷祇有七八%，鋼——八七%，銅——七八%，汽車——六三% (據瓦爾加 Varga 氏估計為五四%)，煤係佔定同年汽車實際生產力可達一千萬輛，但較保守的估定則為八百五十萬輛，此處操業率即係據後一估定算得)，波特蘭水泥(Portland Cement)——六七%，紙——八六%

，鑿業——六八%，因而留有增產的廣大餘地，現時生產量之超過一九二九年，當非偶然的吧。單拿鋼生產力的負荷來說，在一九三八年，僅達三九·七%，一九三九年為六四·七%，一九四〇年為八二·一%，一九四一年為九七·三%，一九四二年估計已達九九%，

與一九二九年相比，業已增加許多，與一九三八年比較，相距更是遙遠。直至一九四三年，即使不增加固定生產設備，鋼產量仍可能上

## 工業救濟問題之檢討

田文彬

增。於此又可看出美國生產力的特點——潛能很大。

### 一

自抗戰以來，後方工業發展，各期均有其特殊的困難，迄至最近，已有一部分轉入生產過剩，資金呆滯，和工廠停閉的狀態。譬如機器和鋼鐵兩業，即屬如此。因為在長期通貨膨脹之下，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已極度萎縮，此時欲繼續興辦新事業和擴充舊事業，已不可得，而政府鑒於社會情勢的嚴重，又改採緊縮政策，愈使上項形勢趨於明顯。在此種情形下，機器和鋼鐵兩業遂不免首先遭難。據翁部長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報告，渝市附近已登記的機器廠計三百六十四處，其中歇業者已達五十五家，停工者十三家，共佔總數百分之十九；鋼鐵廠在四川共登記十八家，自去年六月起至報告時止，已有十家停工，約佔總數百分之五十六。另據民間研究機關估計，機器廠已停工歇業而未具報者，恐與報告數目不相上下，故實際停工者已超過三分之一；民營鋼鐵廠在川省共二十二家，現已停工十八家，計佔總數百分之八十強。此種情形，確屬嚴重，亟應對於當前的救濟方案加以檢討，並尋覓一有效的對策，以求解決。

在各項救濟方案之中，政府當局顯然着重分批訂貨，配售於其他各業的辦法。經濟部工礦調整處曾於去年三月間擬有訂製機器專案，

並撥足一萬萬元作為訂金，至同年八月間，即已將第一批機器全部訂齊，且利用該批機器發動若干新事業，及配售各廠礦作為擴充或輔助設備。現第二批訂貨亦已開始，訂金聞已增至九萬萬元云。此項辦法的效果如何，值得我們深長思慮。

所謂機器和鋼鐵兩業的生產過剩，並不是真正的過剩，而是其生產超過了現在原料、勞工、和運輸設備等所能容許的限度，致使其表現相對過剩的狀態。政府訂貨的目的，是在掃除過剩，並無錯誤，但同時不可忘記，應使原料勞工等亦比例的增加。否則祇將原來已不為社會所收容的機器鋼鐵產品，強令各廠礦消納，其他條件不變，則結果必對現有的原料勞工等增加壓力，可無問題。

假若感覺產品滯銷的，祇是某一單獨的工廠或某一單獨的礦場，無疑的我們可以用收購產品的方法，使其得以繼續週轉。解決了它的產品的問題，同時亦即救濟了它本身。但現在感到產品滯銷的，是整個機器和鋼鐵兩業，情形未免不同。對於該兩業不斷訂貨，配售於其他廠礦，後者亦即須不斷增購原料和僱用勞工，以免機器廢置不用。此時市面原料和勞工的價格必然逐漸抬高，而使某些廠礦購買不起，不得不將以前所需要的騰出一部，讓給他人使用。似此，機器和鋼鐵兩業困難的解決，同時即是其他廠礦困難的發生，救濟了此業，卻犧牲了彼業。若原料勞工等的價格繼續抬高，其他廠礦必將因購買力不斷萎縮而紛紛從市場上退出，最後連機器和鋼鐵兩業本身亦將無

法保持救濟的效果。

在對外交通斷絕，原料和勞工等不能顯著增加的今日，工業生產如何始能圓滑進行，根本須從整個國民經濟中去求解決。目下當局所推行的訂貨政策，其作用祇是將某些實業部門的困難，強制分散於其他實業部門而已，而從社會觀點來看，困難不但未曾消滅，且因抬高原料勞工等的相對價格乃至一般物價之故，或反較前增加，均在意料之中。

## 二

其次，關於時人所擬具的救濟方案，大致可分為築路、造船、和製造農具三種。築路和造船，頗似歐美的公共工程政策，值得考慮的。是它的「間接就業」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得到和上文同一的結論。而況築路偏重於鋼鐵業，且無適量的鋼板以製造車頭，造船偏重於冷作業，亦無適量的鋼板以製造船身，祇能製些木殼機器船，救濟範圍不大，故均可不論。比較可注意的，還是製造農具的問題。

最近數年，敵寇在我淪陷區內，對於農具肆意搜括破壞，無所不用其極，一旦失地盡復，需要補充的數量必多。此次在國際糧食會議中，我國代表即已提出意見，希望各友邦借給我大量的農業機械和牲畜種子等，以為戰後農業復興之用。不過各種高度機械化的農具，在我國一時恐尚難推行。為適應實際情形計，及早由自己來加以製造，以備將來應用，未嘗不是切要之圖。此外，製造農具還有以下兩個好處：第一，發動此項業務，不需要若干間接材料，不發生上述困難分散的問題，至少亦可減至最小限度；第二，所謂農具包括動力機、抽水機、耕作機、農產加工機、和人力獸力工具等，範圍較廣，可使極大的機器廠鋼鐵廠，以至極小的翻砂鋼鐵作坊，都獲得救濟。

照此看來，製造農具比較合理，值得贊同，但其實施時的技術問題仍不無可商榷之處，其中最關重要的一點，即是資本如何籌集的問題。這裏，我們覺得政府切不可再利用其發行權，以辦理籌集的事

務。據專家估計，大量製造農具，約需資本三十萬萬元，數目可謂龐大。假若按照一般人的說法，將此項資本交由國家銀行，有關各部（農林、經濟、財政），以及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等共同負擔，則結果錢無所出，必仍取源於發行。依此推論，對於機器鋼鐵兩業的救濟，須賴於新鈔的增發，這顯然不是好的辦法。於是又有人主張為避免此種流弊計，可由政府以原料和廠家的成品相交換，或發給各廠原料，限令交回成品，另外再給以工資和合法利潤。這辦法似較進步，但政府所能控制的原料是否有如是之多，以及行政效率是否有如是之高，仍成問題。總之，農具是應該製造的，但又不可因此而增加發行，這是問題重心之所在。倘若不能於此二者之間尋一出路，其結果必將徒然引起物價的上漲而已。

## 四

在通貨膨脹的刺激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難於維持平衡的，某些部門的不足，反映於其他部門中，即形成相對的有餘。因此，機器鋼鐵乃至其他各業的產品滯銷，與資本先進國經濟衰落時期的產品滯銷完全不同，表面上是生產過剩，實際則為物資缺乏。

在此種情形下，究將如何謀求有效的解決呢？我們以為政府應該乘此時機來一個通盤的大調整，即將不需要和不健全的工廠的數量併，使其力量趨於集中，工作避免重複，然後再在統一的計劃之下，分配其職務，指導其生產，以澈底掃除有餘和不足的現象，並將有限的物資做最有效的利用。現在所謂生產過剩的廠家，其是否值得救濟，根本就有一問題，各項枝枝節節的救濟方案，無論開的如何美妙，均祇能收效於一時，最後還是真正為社會所需要的實業始能立足。時候到了，我們不可再浪費我們的精力，而應使之集中於有用的方面。敵寇已經完成了若干次的實業重編組，而我們尚無一次。目下實業界已有聯合經營的傾向，政府應因勢利導，善為運用，以達成調整的目的。這是一條坦途，相信我們終於必能走上。

# 縣官在政制史上的地位

周蔭棠

中國昔時所謂親民之官，大都指各縣之縣官而言。(註一)載籍上或亦稱道府為親民之官，(註二)或又謂佐貳雖微，皆有親民之責，(註三)然習慣上並不普遍。道則巡察數郡，府則表率一方，要皆為督導州縣之官，丞佐雜職尚無民社之責。至於寄以地方，寄以百姓，寄以城池府庫，寄以錢糧征收，寄以訟獄判斷，責任甚重，有與民最親之稱，惟縣之正印官足以當之。所謂親民者，即現今所稱基層政治之意也。吾人綜觀前史，無論何代，其整個政制中，縣官之影響，皆為重大。茲試於數千年之演變中，探得其三點特徵，述之如下。

第一、名稱 縣官之職，自古至今，未能更易，惟名稱則稍有不

同處。自秦以至北宋，歷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凡一千二百餘年，大縣曰令，中縣曰長，通常於縣官皆統稱之為縣令。(註四)至北宋，始有知縣之名。緣其初，中央集權，不過欲重縣令之任，以朝官京官知某縣事，凡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謂之知縣，知縣者實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實言之，係以中央官權理地方之事，與縣令不同。逮後罷令，專設知縣，而知縣乃為縣令之專名，曠昔之中央官，遂變成地方官，意義頓改。(註五)宋以後，遼金皆仍稱爲縣令，元則州縣官並以尹名，州爲州尹，縣爲縣尹，外各有達魯噶齊一員，以爲監督。至明又復宋代之舊名，府州縣官皆以知稱，清代因之，知縣之名，凡五百餘年不易。此外，明代地方制度，亦有一與前代不同之點，即秦漢以至元，縣之疆域，雖名以百里爲率，而實因人口之稀稠而增減之，縣之大小，乃至於令長之稱，皆以戶口爲標準，惟戶口數目之多寡，則歷代所定，不盡相同。(註六)明則改以賦糧爲標準，知府知縣，名稱雖一，實分爲三等，其糧二十萬石以上者，爲

上府，二十萬石以下者，爲中府，十萬石以上者爲下府，十萬石以下者爲上縣，六萬石以下者爲中縣，三萬石以下者爲下縣。清代於此，亦屬沿明之舊。總之，無論其爲縣令抑知縣，或其他稱呼，名目雖不同，而其爲一縣之主管官則一，惟此爲真正地方官，中朝雖欲侵佔其職權而終不可能。無論其以人口抑賦糧爲區別等級之標準，面積容有變更，而其爲地方行政區域之基層單位，則毫不能影響之也。

第二、員數 縣置首長一人，爲一縣之主管官，綜攬全縣政務，此爲歷代不易之制，惟至後魏，縣置三令長，亦如其郡置三太守，州置三刺史然。州之三刺史中，必皇室一人，異姓二人，而郡之太守，皇室，二爲異姓，語實無徵。後魏於縣設三令長之外，又創兼攝鄰縣之制，凡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註七)此種兼攝之制，固爲鼓勵肅盜之辦法，然亦與縣設三令長之制有關，蓋惟縣有長官三人，故可分其餘力兼理二縣或三縣，二人兼理三縣，平均每縣仍不少於一人，當可從容集事，若每縣止一長官，兼攝數縣，民事紛紜，如何能勝任耶？清代常有以聽訟或幹練著聞之知縣，得兼斷鄰縣某特殊案件，或派赴鄰縣專辦某特殊事件，然此並非如後魏兼攝鄰縣政務之謂也。金代縣令之設，與唐宋不異，惟縣有置穆昆者，隸於明安之下。穆昆原作謀克，清人改正爲穆昆，滿州語族也，蓋族長之轉，明安原作猛安，清人改正爲明安，滿州語千也，蓋千夫長之稱。金太祖始以三百戶爲穆昆，穆昆十爲明安，繼而諸部來降，契丹，漢人，及渤海軍，奚軍，率用明安穆昆之名，以

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註八)是其初制，源於諸部族間，分置明安穆昆，其後諸州縣亦有置穆昆者，隸於明安之下，職從五品，較諸縣令之秩為高，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惟不常平倉，餘同縣令，是縣令之外，又別有穆昆之官矣。考漢代郡縣守令，勢重權尊，殺人例不待奉報，剿賊用兵皆其職責。(註九)宋史職官志載京朝官知縣事，有戎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是降至宋世，縣官猶兼理軍事，金之穆昆，即以專司軍事而論，已為分縣令之權，況除不常平倉外，餘悉同縣令者乎？職權不清，此疆彼界，失所統轄可知矣。元代於各州縣之州尹縣尹外，具設有達魯噶齊一員，或謂為頭目之意，(註一〇)或直稱州達魯噶齊曰監州，縣達魯噶齊曰監縣，其職係以蒙古人任之。縣達魯噶齊實為一縣之最高權力者，斷掌管印官，并監督全境之官吏，而縣尹一職，則以漢人任之，為一縣行政次官，處理普通政務，實際上，達魯噶齊即主管長官，殆如今日淪陷區內，各縣之日本顧問，而縣尹反處於輔佐縣政之地位也。由上所述，可知正常規制，一縣之長官，只有一人，惟後魏有縣令三人，金於縣令外，有所謂穆昆者，元於縣尹外，有所謂達魯噶齊者，斯為例外，蓋此三代皆以異族入主，既猜忌之橫生，思有以嚴防漢族，而其習慣故事，又本不與中夏同，於是乃有此變制耳。清代以滿族統制中國，而一切制度，多由舊章，中央各官，漢滿並用，地方長官，亦止一員，無兩人以上並列一缺之事，然自入關以至咸豐初，滿人為督撫者十之六七，順治時曾欲將各省督撫盡用滿人，賴齊介抗疏力爭而止，(註一一)乾隆時又欲盡用旗人為知縣，賴劉統勳徐善諫而止，(註一二)故自乾隆以後，除奉天府縣各官，定制專用旗員外，(註一三)其他各州縣，皆無是例，此亦清人之善於適應中國環境，所以能延國祚至數百年之久，而異於拓跋女真蒙古歟！惟八旗編制，與金之部伍相近，各地駐防之八旗佐領，於訓練外，隱然兼司牧之任，此則與金代縣令之外，別有所謂穆昆者又相同，而清代系統較為嚴密，且駐防所在之縣亦不多耳。

第三、人選 一縣長官之優劣，與一代政治之隆污，有密切關

係。其將縣職看重，人選嚴格者，必為新興統一或太平鼎盛之朝，其社會鄙視縣官，政府任人濫雜者，必為割據短促，或帝國崩潰之際，證諸史籍，歷歷不爽。漢代郎官出宰百里，天子不輕以授人，刺史巡視郡國，不得輕辱黃綬，(註一四)所以重其職者甚至。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唐明皇納張九齡之言，猶行此制。宋初慎選朝官出知州縣之事，孝宗時，定制縣令以三年為任，非經兩任，不得除監察御史，(註一五)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雖宰相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明初廣徵天下賢才，為州縣之職，救命厚賜，以勵其廉恥，又敕諭之，至於再三。(註一六)其行取之制，知縣得入為科道，此猶襲往代必經縣令始得為臺郎御史之遺意。(註一七)漢晉之初，唐開元宋乾道明洪武，皆昇平盛世，而其重縣令之選如此。反之，如南北朝時，縣令多由廝役任之，縉紳之流，恥居其位。五代時凡龔隤無能者，始注為縣令。宋天聖及政和間，縣令之選猥下，士大夫輕之。(註一八)明中葉以後，亦重內輕外，州縣官多浮濫闕冗，不得其人。由上正反兩方面事實觀之，中國史上，任何朝代之盛衰，完全繫於州縣之臧否，而州縣之臧否，又完全繫於長官之優劣。清代疆臣閻敬銘曰：『自古未有不慎選牧令而能治天下者』。中國昔時之所謂吏治，幾即完全指州縣官之本身而言，此種觀念蓋已經極長久時間之醞釀矣。(註一九)

綜觀以上所舉名稱員數人選三項，縣官在政制史上之地位，約略可知。惟自明至清，五六百年間，名稱定為知縣，是中央官之權理，已成為地方上之經常正印官，員數定為一人，是縣屬大權已能集中而不分散，此兩項皆已不成問題。只人選一層，輕重嚴濫，曲折繁複，因時而異，前後不同，此所謂吏治問題，真正成一大問題，一切縣政，率由此中發生出來。明代官吏登庸，表面上以科甲出身為正途，末年考場，多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之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為道地，或伏謁，或為之行金，購於諸上臺，使得棘園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握券而得也。(註二〇)關於銓選，表面上聽吏部擇人注授，而

上下其手，予奪任意之事，亦所難免，後乃行掣簽之法以防弊，雖不能為人擇地，亦不能為地擇人，人與地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罷斥者。(註二)關於考核，表面上由於撫按執行，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為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親，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註三)縣官之任用與考核，皆失其所，於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國亦隨之以亡。明代之顛覆，流寇與異族，不過其近因，縣政腐敗，實為一最大要素。清代上承朱明，下啓民國，演變至今，影響未替，余更有專篇敘述焉。

(註一)參看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九十三所載同治三年四年閩蘇銘兩疏。惟請代屬州之知州及專管地方之屬廳同知或通判，皆與縣官相等，自亦同享親民之權。

(註二)參看皇朝文獻通考卷五十七所載乾隆二年諭旨及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七所載陳廷敬請考試正印官疏。

(註三)參看歷代職官表卷五十四。

(註四)惟封建系統中之侯國，實等於縣，以相治事，亦等於縣令，名稱稍異耳。(註五)參看黃宗羲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及隨園隨筆官職類宋知某縣事非縣令條京朝官之分條。

(註六)考漢代縣制，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萬戶以下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然因時變遷，亦非一定。孝武開疆，邊縣戶口數百而或為令，荆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耳。及南陽蠻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亦名為長。桓帝時以江南陽安為女公主邑，改號為令，主薨，復其故。此令長大小之殊，又未可概以漢書百官表為斷之說。三國六朝，仍規漢法，以縣之大小，分之品秩。如劉宋，縣令千石至六百石，長五百石。梁陳，官五千戶以上縣令相，品第八。不滿五千戶以下縣令相，品第九。後周則戶七千以上縣令，五命，戶四千以上縣令，正四命，戶二千以上縣令，四命，戶五百以上縣令，正三命，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二命。其等差較漢代為尤析，而縣之戶口益少，蓋其時戰爭之餘，境土既促狹，戶口復凋弊，不得不然也。唐代除京都及京畿附近之縣外，諸州之縣，所可考者，六千戶以上為上縣，三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三千戶為下縣。宋則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繁上中下，四千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繁，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金則凡縣二萬五千戶以上，為次赤畿，二萬以上為次繁，在諸京衛軍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為上，三千戶以上為中，不滿三千戶為下中。元則始以六千戶以上者為上縣，二千戶以上者為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為下縣，後以三萬戶以上者為上縣，一萬戶以上者為中縣，一萬戶以下者為下縣，因合併

江淮以南之地，人口稠密故也。

(註七)參看文獻通考卷六十一制史及卷六十三職官。

(註八)參看歷代職官表卷十七理藩院卷四十四八旗都察院卷五十四知州知縣等官。

(註九)參看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二劉沛都縣誌。

(註一〇)隨園隨筆官職類元知府或有或無條云：『所謂達魯花赤者，國言荷包，取管轄之義，福州達魯花赤曰監州，縣達魯花赤曰監縣。』歷代職官表卷八戶部倉場衙門達魯花赤條云：『蒙古語，頭目也，原本作達魯花赤，今改正。』魯一國邪州志有云：『按元官多以赤名，如必開赤玉典赤怯里馬赤之類。此云達魯花赤，亦總轄之義。』

(註一一)詳見徐河清神類鈔及清鑄綱目乾隆八年御史杭世駿之對策。

(註一二)詳見李元從清先正事略劉劄傳。

(註一三)奉天府各官，尚俱漢滿兼用，乾隆十六年定制專用旗員，參看皇朝通志卷六十九職官略六，及大清會典事例吏部漢員選選類奉天州縣各員缺揀選內所載乾隆二十七年諭旨及五十四年奏准文。

(註一四)案漢代縣官，銅印黃綬，成帝時曾改為墨綬，哀帝時復舊，劉宋時又改為墨綬，唐時縣官仍舊黃綬，詩人有『新加大邑仍黃綬』之句。

(註一五)參看趙翼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考，及顧炎武京官必用守令條。

(註一六)案明初天子敕諭，直下州縣，不須經承宣布使司，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謁。清雍正元年春正月即位之初，連頒諭旨十一道，上自督撫，下至州縣小吏，皆說千言數語，此固由雍正勵治之急，或亦清襲明初之辦法也。清代州縣授任之初，有吏部引見之例，而入覲受計之制，迄未行也。

(註一七)參看王慶雲石渠餘記及清朝文獻通考五十五選舉九康熙二十三年乾隆七年十六年。

(註一八)關於宋代縣令之任用，馬端臨熟於本朝掌故，文獻通考載之甚詳，凡天聖慶曆政和宣和靖康紹興乾道慶元諸朝有所規定也。當參看。

(註一九)漢代六條察吏，只言法，未言人，只言具體事項，未言抽象心理。北周亦有所謂六條，地方官必須誦習，其第一條主張先治心，謂：『心不清淨，則思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此種清心以治民之思想，當受魏晉以來王肅偽古文尚書人心惟危等語之影響。自宋以後，發展尤烈。

(註二〇)詳見研堂見聞雜記。參看虞陽說苑張漢儒攻訐錢益程程式疏。

(註二一)參看顧炎武選補，趙翼明吏部權重，及歷代職官表卷五吏部。

(註二二)參看明史循吏傳序及趙翼明初吏治，又清人王命岳論吏治不清皆由舉劾不當，疏有云：『當明季時，緣法法弊不實，廉潔者苞苴不入門，則目為罷職，貪婪者金帛相承奉，則盛稱幹才，甚至糾為貪者皆真廉，獎為廉者乃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橫行，民生日蹙，則致亂亡，興言前事，足為殷鑒。』言之可謂深切。

## 隋唐五代的歲貢科舉

曾資生

隋唐取士的科目，有由學館生徒者，有由制舉者，有由州縣者，制舉科目頗多（詳拙著唐代的制科一文），大都由君主親臨考試，以待非常之才。其由州縣者則爲鄉貢，初步由州縣加以甄別考試，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新唐書選舉志云：「不由學館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寮屬，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其所定科目，則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舉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外尚有童子萬言，百篇之目，都是屬於歲貢科目的範圍。茲將各科分述如次：

秀才、漢制郡國貢，秀才孝廉，後避光武諱改曰茂才，歷魏晉南北朝均有此科。隋時秀才爲最高科目。唐書杜正倫傳：「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所稱。」芒維遺文彙誌銘云：「開皇中應詔舉秀才，任汲郡朝歌縣丞。」同書趙庭嘉誌銘云：「祖諱孝鈞，隋秀才登科，初補校書郎，轉益州都宰。」同書徐純嘉誌云：「以秀才升第，闕國子學生，頻遷著作。」又舊書薛收傳云：「大業末舉秀才固辭不應。」隋時舉秀才，則試方略。（隋書七六杜正玄傳云：「開皇末舉秀才，尙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唐初亦爲最高科，且因隋備試方略，其後但限制策舉，貞觀中遂廢而不舉。通典云：「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

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封氏開見記亦謂唐初秀才試方略策三道，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爲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唐張昌齡傳云：「弱冠以文辭知名，本州（冀）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因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按昌齡曾於貞觀二十一年詣闕獻頌。）其後復有此舉，但實質已替，通典原注云：「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送者並停。」其時士族所趨在明經進士二科，故秀才一科，實際上等於廢絕。但至寶應二年，則又復秀才孝廉，停明經進士。舊唐書禮儀志云：「寶應二年六月勅令州縣每歲察秀才孝廉取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是年七月二十六日禮部侍郎楊綰奏定貢舉條目，秀才舉人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全通者爲上第；上第送名中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爲中第；中第者送史部與官，下者罷之（會要）。自後有經由秀才登科者，如馮伉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有秀才科，授秘書郎中（本傳）。然明經進士之科行之積久，已爲社會人士所重，故旋又勅令秀才孝廉與明經進士諸科兼行，終唐之世，秀才一科，仍越沒落。

孝廉 孝廉亦漢代郡國貢舉之一科，歷魏晉南北朝仍在其制，不過名存實亡而已，至隋復重其科。（如張行成大業末祭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見舊唐書本傳。）唐因隋制，貞觀十八年二月六日引注



麟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孝經，並不能答。是初唐孝廉之舉，亦空虛無實。中間此科遂替。至寶應二年六月二十日，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旨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之行薦焉。是年七月二十六日楊綰奏定貢舉條目，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儀禮，毛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旁通諸義，務窮根本，試格策三道，問古今治體及當今時務，要取堪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頻三日畢。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史部，便與官；其問義每條通七，策通二爲中第，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爲一經，其試如上。勅旨與進士明經等舊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勅孝廉科宜停。

明經（包括學究一經、兩經、三經、四經、九經）漢制歲貢明經，內入仕通階，魏晉南北朝仍踵其遺制，然已有名無實。至隋此科復重，隋文開皇九年詔云：「……生徒受業，升進於朝，未有灼然明經高第，此則教訓不篤。考課未精，明勅所由，隆茲儒訓。」（隋書本記）其時如韋雲起開皇中明經舉符璽直長（唐書本傳）。煬帝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至者甚衆，又如孔穎達大業初舉明經，授河內郡博士，這是經學的復興時期。因而明經一科，亦成爲入仕與出身的要途。唐因之。其初止於策試，貞觀九年勅，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并儀禮者，於本色量減一等。永徽四年三月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上元元年，武后表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咸合習讀，一准孝經論語，所司臨時試。二年正月勅明經咸試老子策二條。儀鳳三年三月勅自今已後道德經孝經並爲上經，貢舉皆須兼通，其餘經及論語任依恆式。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加帖經。永隆二年八月，以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摘義條，纔有數卷，詔自今以後，明經每經帖十得六以上者然後令試策。長壽二年，武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神龍元年停臣軌，復習老

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文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量配作業，并貢舉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開元十六年十二月，國子祭酒楊綰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一二，恐左氏之學廢，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亦請量加優獎，遂下制明經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二十一年玄宗新注老子成，勅令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條策，加老子策。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自今以後，每經宜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十義十條，取通六以上，免試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委所司奏，聽進止。天寶元年停老子，加習爾雅以代之。十一年禮部侍郎楊綰始開爲三行，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爲通。問通爾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爲第。明經自隋以降有四等，分甲乙丙丁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大抵千人之中，所收不過十一二而已。寶應二年依楊綰奏停明經，但旋即復故。建中二年十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奏，應口問大義明經等舉人，明經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唯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寢微，莫不由此，請約貢舉舊例，稍示考義之難，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今請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既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證，憑此取舍，庶歸至公。如有義策全通者，五經舉人請准廣德元年七月勅超與處分，明經請減二選。勅旨明經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開奏，續商量處分，餘依奏。貞元年四月勅以此來所習爾雅多是鳥獸草木之名，無益理道，宜令習老子道德經以代爾雅。同年五月勅自今以後，明經習禮記及第者評冬集。貞元二年六月